

舊田新農

——有機農業落戶香港的過程

鄭肇祺

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提要

本文探討有機農業在香港的本地化過程，以及農夫在中港政治、香港身份認同建構、環境保護及食物安全等議題中的角色。香港農業在20世紀經歷巨變，蔬菜種植成為農業體系的主流。從內地來的移民組成主要的群體，經歷「蔬菜革命」的高峰後，受到全球化的挑戰，也面對農業人口老化、環境污染及食物安全等問題。都市來的新精英引入有機農業，媒合農夫與社區，開拓新的市場渠道，卻要應付消費者對有機蔬菜原真性的疑惑。作為治理工具的本地有機認證機構，受限於香港人對內地食品的不信任，無法將業務拓展至邊境的另一方。在爭論什麼是可信的過程中，有機農產品不單是商品，也是道德經濟的產物。近年的本地環境運動及香港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有機農夫扮演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農夫、原真性、香港身份認同、生活態度、有機認證

鄭肇祺，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 B 棟208室，郵政編碼：95092，電郵：chengsk@nttu.edu.tw。

筆者在2007至2009年修讀人文學研究碩士期間，獲得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研究經費撥款資助田野及文獻研究工作，部份研究內容曾於2009至2012年間在香港人類學會、東亞及東南亞人類學會、加拿大亞洲研究學會發表，經與會者指教後，又於2011至2018年陸續收集及分析補充之田野資料，修改成本文，謹此致謝。同時，謹把此文獻給香港農業社群的報導人以及合作夥伴，感謝他們的支持及貢獻。

一、香港有機農業的「良心菜」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筆者踏出新界錦田市的鐵路站，一跌一碰地騎着單車，沿着隨鐵路工程而興建的馬路，^①轉進錦田河旁、以水泥建成的金水南路。河的對岸是發展商拆掉寮屋及填平農田後建成的低密度住宅。鐵路、馬路及住宅，吸引了從都市遷入的居民。此時，筆者沿着通往石崗軍營的小路，到達水流田村邊緣一個面積兩斗、曾為水稻田、現在以蔬菜生產為主的有機農場。^②這天，筆者協助有機農夫阿生清除茂盛的「野草」。^③香港農夫以蔬菜為主要農產品，而夏天屬淡季，因為天氣炎熱多雨，廣受消費者歡迎的十字花科作物（例如菜心、白菜、芥蘭等），受到「害蟲」侵擾的機會比秋冬多。而且，雨後田間野草生長迅速，需要人手拔除，以減少土壤營養的損耗。

阿生喜歡跟筆者分享其有機理念，包括有關「害蟲」的觀點：

其實，是人在判定什麼是野草；另外，吃掉人類喜歡的菜的蟲類，就被視為害蟲。常規農夫為了賺錢，會用化學農藥把害蟲除去，^④轉營成有機農夫後，他們也要用混合有機農藥把蟲殺個片甲不留。對我來說，順天而行、不時不種，減少昆蟲對農作物的影響，才是有機耕種的真正定義。有機菜是「良心菜」，農夫投入什麼，生產什麼，要誠實地告訴客人；客人也要知道誰生產他們的食物，並尊重農夫。我每天面對着自然生態及季節的種種限制，但不能為了市場違反自然定律。認同有機耕作的理念並願意購買我們的農產品，就是社區支持有機農業的原則。

阿生本是工程人員兼假日農夫，^⑤後來轉為全職農夫後，一直拒絕聘用黑市

① 錦上路九鐵西鐵站現屬於香港鐵路西鐵線，為錦田、八鄉地區居民來往區內外的主要車站。

② 新界的農田面積是以斗種(*dou or dou chong*)為單位，一斗種等於7,260平方呎。

③ 「農夫」是中性詞，但有些人會稱女性農夫為「農婦」。「農友」則是香港農業部門及其他人對農夫的友好稱呼。本文以「農夫」形容所有耕作的人。

④ 常規(*conventional*)農業是指農夫利用化學產品（如化學肥料及農藥）來增加產量的耕作方法；在香港，常規農業也被稱為傳統農業。其他華人社會亦稱之為慣行或慣習農業。

⑤ 本文出現的人物名字皆為假名，以保障受訪者的隱私。鄉村、政府機構及地區名稱則維持使用真名稱呼。除嘉道理農場及有機資源中心外，其他有機農業組織皆使用假名。

勞工，^⑥ 獨自經營有機農場，也避免在隱瞞顧客的情況下使用有機農藥。銷售方面，每逢星期日，阿生和擔任教師的太太各自把農產品帶到大埔新市鎮及中環市區的假日有機農墟銷售。^⑦ 因為人手不足，他樂於見到筆者偶而來農場當義工，協助完成一些粗活。後來，水流田的田主收回農地，阿生改於同區另一個村落租地耕種，因土質偏為砂土，不利於種植葉菜類，他逐漸改向根莖類、茄類作物發展；他和太太亦決定只固定在一個農墟出售農產品。但對長期支持阿生的有機蔬菜共同購買團體而言，其農場的產量偏低，且不穩定，經常出現缺乏葉菜類農產品的情況。對於阿生等認為有機種植是「良心事業」的農夫而言，「種有機」不只是一套放棄化學肥料、農藥的農田管理技術。他們從城市走到鄉村，透過「種有機」來實踐與香港主流上班族不同的另類生活方式；「種有機」更是一種與自然環境共存的可持續管理模式，使農夫及消費者透過食物生產及消費，反思工業化、都市化及全球化帶來的環境及社會後果。因此，本文以「舊田新農」為題，強調歷經滄海桑田後，有機農業為香港新界的農業帶來了新的景況、社群及挑戰。

二、從未消失的香港農業、復活的農業社群研究

20世紀初以前，香港的農產品以水稻為大宗，輔以根莖類、家禽及牲畜等，耕作者常以聚居方式獲得密集的人力資源，以管理及保護水土資源。宗族村落作為農業社會的基本組織，曾以稻米為大宗農產品。^⑧ 蔬菜種植相對而言屬於次要之生產活動。隨着1910年代後稻米進口增加，本地稻米逐漸失去競爭力。^⑨ 除戰亂時間外，香港在20世紀人口一直暴增，政府一方面積極發展九龍邊陲，另一方面鼓勵逃難到香港的移民，轉移到新界租用農地，或

⑥ 由於香港有機農夫普遍未能找到願意長期在農田工作的香港勞工，因此從內地引進黑市勞工一度成為風氣。2009年後，勞工處准許農夫在每僱用一位香港居民後，申請輸入兩名內地勞工，除固定薪金外，還提供食宿及勞工保險。香港農夫以黑市勞工補充近年銳減的香港農業人口的問題隨之解決。

⑦ 農墟在其他華人社會被稱為農夫市集。

⑧ James Watson,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⑨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米業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5）。

者開墾位置偏遠的官地，經營產值較高的菜場及禽畜養殖場。^⑩ 政府透過此舉同時解決都市之難民問題，帶動城市經濟發展，並尋求社會穩定。^⑪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及其他國家一直出口蔬菜及其他農產品至香港，本地農夫面對的是競爭激烈的全球農產品市場。由於農產品的價格根據市場供求而浮動，農夫需要運用個人的耕作知識及技巧，對耕種方法作出調節，從而提升作物產量及品質，以維持生計。

1950年代起，學者陸續以宗族及農民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田野調查，其民族志或研究報告刻畫香港農業的社會組織及文化策略，分析農民如何利用其社會及文化資源來加強其競爭力及經濟利益。其中，Marjorie Topley 在1960年代已討論本地人與客家人在農作物選擇上的族群分工及蔬菜種植技術的傳授過程，並探討他們如何利用鄉村的人際網絡獲得資本。^⑫ Jack Potter 於屏山的宗族研究中，論述農村在香港的資本經濟發展中變得繁榮的過程。他認為常規農業的出現及蔬果產品的市場化，對農村內的基礎建設和對外交通發展產生影響，農民不再屬於自給自足的社群，而是和外界互動的職業農夫。^⑬ 由此可見，當時的農民已經在面對全球化及都市化為他們帶來的轉變。因為技術、資金及富有種菜經驗的移民加強了本地農業的產銷產能，新界出現學者所謂的「蔬菜革命」，地景從水稻田急速變成菜田。^⑭ Göran Aijmer 針對新界沙田的中國移民聚落進行研究，^⑮ 描述他稱為「經濟人」的佃農如何透過在鄉村的移民親戚及朋友關係，獲得不同的經濟及農業資源，並在不同季節及環境下快速選擇農產品種類，以求能在市場上獲得最大利

⑩ 朱耀光訪談及整理，〈羅海東先生口述歷史〉，2017年11月14日、2017年12月13日，<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APO/documents/794617/794715/180307-hihill-oralhistory-B3-v2.pdf>。

⑪ Christopher A. Airriess, "Governmentality and Power in Politically Contested Space: Refugee Farming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1945-197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1:4 (2005): 763-783.

⑫ Marjorie Topley, "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among Indigenous Rice Farmers and Immigrant Vegetable Farmers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in *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in Peasant Societies: Studies from Asia, Oceania, the Caribbean and Middle America*, eds. Raymond Firth and B. S. Lamley (London: Routledge, 1964), 157-186.

⑬ Jack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⑭ James Watson,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42-46.

⑮ Göran Aijmer, *Atomistic Society in Sha Tin: Immigrants in a Hong Kong Valley* (Göteborg: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1986).

潤。^{①⑥} 廖迪生於1990年代初研究一個位於元朗沿岸、由宗族租借土地而建成的移民聚落。^{①⑦} 他分析道，當地居民面對不斷改變的市場需求，靈活運用土地和水資源去轉變農地用途（如稻米和蔬菜種植，以及魚塘和禽畜養殖等）。農夫混集在地和科學的知識，以及其作為社區成員的自主性，在廖氏的研究中亦得到重視。以養雞為例，農夫避免相互探訪從而保持牲畜的健康，也增強了個人在市場的競爭力。^{①⑧}

香港農業社群的社會科學研究自廖氏後沉寂下來，筆者認為與本地農業的衰退有關。當農夫從專門化的農業生產中獲利，他們的耕作及養殖方式造成環境污染及食物安全問題：1950至1970年代期間，政府和農業機構着手推廣化學農藥及牲畜疫苗的運用，農夫們紛紛加強生產密度，並利用農具店提供的不同藥物控制耕作及養殖環境，除了河水漸漸被大量未經處理的動物糞便污染，市民也日益擔心食用本地或內地入境的農產品會為他們帶來健康問題。1980年代，政府推行計劃進行有關的監管工作，卻提高了農夫的生產成本。更可惜的是，內地農產品在1976年後大量輸港，導致香港農業在1990年代中期嚴重衰退。^{①⑨}

研究者了解香港農夫對鄉郊土地再想像的過程時，不能忽視社會對農夫身份的重構。1973年後部份新界農田被劃為可興建小型屋宇用地，對鄉村土紳及從事其他職業的宗族成員而言，農業生產不再是他們賴以為生的經濟活動。^{②⑩} 當大部份農夫改到市區工作，農地逐漸被荒廢，成為臨時工場、回收場及鄉郊康樂用地；接近市區及新市鎮的土地變成有價值的商品。陳奕麟認為，自1950年代起，因殖民地新市鎮發展計劃變得頻繁，政府以人口膨脹、市區過度擠逼及鄉郊基礎建設的需求為由，合理化新界土地發展。在香港政

①⑥ Göran Aijmer, *Economic Man in Sha Tin: Vegetable Gardeners in a Hong Kong Valley* (London and Malmö: Curzon Press, 1980), 20-34.

①⑦ Tik-sang Liu, *Becoming Marginal: A Fluid Community and Shamanis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Ann Arbor, Michigan.: Bell & Howell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1995).

①⑧ Tik-Sang Liu, "Custom, Taste and Science: Raising Chicke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outh China," *Anthropology & Medicine* 15:1 (2008): 7-18.

①⑨ 在2011年一個筆者有份參與有關香港農業前景的閉門會議中，非政府組織山明水秀田園根據農業部門的資料，匯報香港農業在近10年共佔地9.34平方公里，擁有4,600個農夫及工人經營2,500個農場，生產總值為港幣743,000,000元。

②⑩ 根據 James Hayes 的紀錄，殖民地政府在1982年引入區議會制度，作為都市化下的一個新市鎮諮詢及管治架構，也影響了鄉紳們在新界的固有權力。James Hayes,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4.

府和鄉紳的討價還價下，自1970年代起新界的都市化普遍提升了農地價值。自1973年起，新界原居民的男丁都獲得丁權，可在所屬的鄉村村界(v-zone)農地內申請興建一幢三層、每層面積700平方呎的小型房屋，俗稱丁屋。丁屋建設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持續進行。陳氏認為土地作為產業不再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物質生活(material livelihood)及社會根源(social rootedness)的重要構成部份。在農業衰退及殖民政府的政治干預下，曾兼具農夫身份的宗族成員紛紛轉投勞工市場或出國討生活，他們往往以金錢利益來衡量新界鄉郊農地的價值。^{②①}

20世紀末，香港農業的人口結構再次出現變化。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數以百計的人通過假日農夫方式從城市回到鄉郊土地，進行有機耕作；縱然在郊外的勞動只佔他們日常生活中每星期的數小時，參與人數也少於1990年代為數過萬的職業農業人口，^{②②}但在二十多年有機農業落戶香港的過程中，部份假日農夫成為供應本地菜的兼職或全職農夫，又引進不同的環境保護觀念，甚至重新為耕種下定義、再包裝，這股力量使農業在香港的環境保育運動、中港關係及都市、市場發展的反思中佔一席位。

有機農業成為本地農業得以延續的契機，這個轉變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自筆者於2007年開展香港有機農業的研究以來，以香港農業為主題的論文陸續出版，包括 Chan Kin Wing 和 Byron Miller 重新整理香港養豬業歷史，藉此探討殖民政府如何把權力延伸到新界；^{②③}陳玉華針對香港身份認同及食物安全，重新審視香港農業的社會、文化及政治意義；^{②④}黃舒楣則說明香港人如何利用不同城市的空間發展都市農業，以生產農產品為香港城市規劃的另類型態。^{②⑤}

②① Chun Allen Uck Lun,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2000), 125.

②② 在這註明職業農業人口是由於農業部門在統計農業人口時包括全職和兼職農夫；在新界，不少農業家庭人口成員在市區從事全職工作，空閒時間才留在家，協助務農為主的父母處理農務。

②③ Chan Kin Wing and Byron Miller, "Capitalist Pigs: Governmentality, Subjectiviti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Pig Farm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1950-1970,"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6 (2015): 1022-1042.

②④ Chan Yuk Wah, "Food Localism and Resistance: A Revival of Agriculture and Cross-border Relations in Hong Ko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7: 3 (2016): 313-325.

②⑤ Shu-Mei Huang, "Urban Farming as a Transformative Planning Practice: The Contested New Territori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ay 17, 2018, <https://doi.org/10.1177/0739456X18772084>.

以上學術文章以政治局勢、社會網絡、組織、文化策略及市場行為的角度去理解香港農業社群，實在值得參考。本文的重點則在於1980年代後，香港人對農業及農夫重新定義，以及農業與生活態度的關聯。當中，耕種模式的轉變以及社會對農業印象的轉變，受到環境保護及食物安全議題的影響，這些過程值得學者詳細討論，從而闡述像阿生這種有機農夫如何在香港擔當新的社會角色。本文提出數個了解香港農業社會的基本問題：在農業衰退的現代香港，為什麼有機耕作能成為香港農業的新力軍？誰才是有機農夫？誰傳播有機的概念，並以有機食物作為社會及文化資本，促進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經濟收入？

本文首先以筆者的田野研究經驗出發，簡述香港有機農業社群的特質；然後，將說明本地蔬菜生產及供應系統以及「耕住合一」的新界農村生活的延續與變遷；接着分析有機農業的出現，及其與本地社區的結合，當中有機理念中反思資本主義的部份，加強有機農夫在環境運動及食物安全中的角色；最後，透過有機食品原真性及有機認證爭議的探討，筆者將提出有機農夫在環境運動及香港身份認同政治的新角色。

三、研究經驗：香港有機農業社群的信任與猜疑

作為一個成長背景和香港農業生產沒有直接關聯的人類學學生，筆者在2007年首次到訪有機農墟。有趣的是，筆者第一位碰到的有機農夫，外表和課本上的形象毫不相同：沒有戴上客家帽子，只着輕便的恤衫、牛仔褲，配上鴨舌帽，站在菜檔前，運用流利的英語和客人交流。這位農夫說，農墟以外的顧客，會在平日下訂單，她早上駕車到田間收割，再送到香港島，把菜交給客人，然後上班，不少顧客是她工作上的伙伴。有機農夫阿生給我介紹的第一位朋友，是每週向他訂購有機蔬菜的「共同購買」小組的組長。^{②⑥} 該組長常稱自己及小組成員為家庭主婦，體力上不足以每天處理農務。筆者藉着這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網絡成為該小組的義工，透過他們的活動，接觸其他和合作農夫及有機業界的業內人士，再擴展個人網絡到認證機構、認證農

②⑥ 簡單而言，共同購買是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的一部份，指消費者組成一個小組，共同訂購有機農產品。在香港，共同購買的方式眾多，其中包括由社會工作者組織的小組，也有屋苑居民自行組成的小組，亦有由個別人士聯繫其他消費者而組成的小組。

夫及其他與農業有關的環境保護機構。

筆者於2007至2011年在香港進行田野調查，主要跟進約30名農夫、一個消費者團體和四個相關組織（包括一個認證機構、三個農夫組織），參與有機農業的經驗，及透過訪談，了解農夫及團體成員對二次大戰（1945）後香港農業變遷的看法；筆者亦持續到訪三個有機農墟（華人社會普遍稱其為農夫市場），觀察有機蔬菜的消費情況。2009年，全港參與農業部門有機支援計劃的有350個有機農夫，以每名農夫擁有約20名支持其理念及耕作模式的相熟客人計算，這個被稱為有機農業業界的社區人數約為7,000人。不過，由於農夫平日常常於農場獨立活動，在農墟舉行的日子才有機會和其他農夫及消費者碰面，筆者所描述的「社區」，是以香港政治邊界為界線，生產者及消費者不斷互相協調及競逐的「本地」及「有機」兩詞的定義，並透過合作及競爭而成的一個群體。本文對本地有機農業的定義取自香港一個關注有機農業的組織（本文稱為香港有機協會）：於香港生產，並在生產過程中，避免使用任何化學農藥及肥料，減少不同程度的污染，從而維持一個支持物種多樣性及有生產力的生態系統，生產出健康和安全的食物。筆者對不同的定義持開放的心態去理解，是由於在紀錄有機食品定義的過程中，可從原真性(authenticity)的角度去討論有機農夫彼此之間的合作與角力。

本文的研究對象都表示十分關注食物安全、個人及家庭健康等問題，同時在訪談及觀察中，經常提及他們對環境保護意識、內地和香港的各種對比及香港城市裡被邊緣化群體的觀察。他們並不是社會運動、遊行示威及壓力團體的組織者，但是他們希望透過日常生活對有機農業生產和消費的支持，來表達對社會的一些不滿。手拿筆記、掛着相機並願意奔走於各個和有機農業相關活動的筆者，成為他們眼中可信賴的記錄者及說故事的人。筆者被肯定成為業內人士(insider)，²⁷ 是從主動協助不同粗活開始：除草、搬桌椅、收拾農墟的用具、成為認證機構的義工等，以一年多甚至更久的時間被圈內人士接納，並在不同場合被介紹給新的報導人。透過這種信任，筆者甚至能在農墟裡站在農夫身邊，協助修剪菜葉、向顧客講解農場情況，以及看守錢箱，同時也與不同機構職員討論有機農業的前景；和受訪者建立起的友誼，使筆者能多次在不同場合與部份主要受訪者進行訪問。筆者還透過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會有機資源中心、

²⁷ 筆者長期、頻繁地出現，使報導人們信任本人願意長期進行研究；只出現數次就帶着簡短的資料離開的其他記者、做功課的學生，對他們而言不能稱為朋友、業內人士。

嘉道理農場等機構收藏的政府檔案、香港農業出版物及傳媒報導，蒐集及分析檔案、文件，和業界人士的口述香港農業史相輔相成。2011年後，筆者多次進行跟進訪談及參與觀察，甚至以學者身份加入推動本地農業，從而親身了解該社群成員在行為及觀點上的各種變化。

有機農業業界也是一個充斥着互相關懷及猜度的圈子，筆者因此成為圈內人的報導人，經常被打探其他人的近況。其中，筆者被圈內人詢問最多的問題是「你最近探訪某農場時有沒有發現什麼異樣」。所謂異樣，就是農夫偷偷地用上化學肥料或農藥，甚至在其農產品中混入其他不明來歷的蔬菜。由於有機蔬菜和常規蔬菜在外表上難以區別，農夫魚目混珠的舉動是有機業界可預期的事情，徹查來龍去脈，卻甚為艱難；就算農夫目擊可疑狀況，也不會公開向農墟及有關認證機構指名道姓投訴，以免破壞和其他農夫的個人關係。這種經驗，使筆者明白，研究香港的有機農業社群，了解謠言、誤解及懷疑的成因及過程，有助於梳理圈內人的各種社會關係；但是，研究者也需要注意及保護受訪者的私隱權，既可獲得各人的信任，也能保障研究對象。

四、政府介入下的蔬菜生產及供應系統

官方組織如農業部門及蔬菜統營處的年報，²⁸ 把部份香港的農產品產量、種類及價值等數據呈現人前，但未必能呈現非正式的農業狀況，因此民間的資料應該得到重視。人類學家除從數據理解農業的興衰外，也可以透過整理農夫的口述歷史及在民間收集到的文獻等方式，讓農夫道出他們的故事。在這一節，筆者以這些文獻及田野資料為依據，審視香港蔬菜生產及供應系統的延續及變遷。

新界的土地適合稻米耕作，²⁹ 在19世紀以前，大部份田主及佃農都以農

²⁸ 香港的農業部門過去在政府架構內多次重組及易名，前後包括農業部、漁農署、漁農及自然護理署等，為求文順，本文只用農業部門一詞。

²⁹ Charles Grant 讚揚元朗錦田、大埔林村等地的沖積土壤 (alluvial sediments) 及豐富水源使稻米生產能以一年兩造形式進行，見 Charles Grant, *The Soils and Agricultu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82-112。William Blackie 則描述1950年代時稻米田佔地較多，蔬菜是稻田冬季時的間作作物，配以根莖類植物（如蕃薯），作為農村食物及牲畜飼料，見 William Blackie,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Hong Kong: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72)。

耕作為首要的經濟活動。^③ 當1898年新界成為殖民地的一部份後，從前已定居下來的宗族，通過獲得殖民地政府給予的原居民身份，登記及繼續持有土地，^④ 農地出租依然是個人和祖堂重要的收入來源，佃農也是世代相傳，以口頭合約的形式租用農地。20世紀早期開始，進口大米增加，以種植水稻為生的農夫受到影響，^⑤ 加上逃避戰爭而從內地遷到香港的人口激增，副食品包括蔬菜及肉類等出現龐大需求。^⑥ 一些內地移民及本地農民在稻田改種蔬菜以及其他經濟作物如花卉，維持家庭生計。

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及中國內戰（1949）結束後，殖民政府開始整頓香港的蔬菜及副食品的供應，以穩定當時政治狀況。負責相關工作的農業部門除在二戰後鼓勵市區的移民到新界種田，^⑦ 亦陸續引入不同的化學農藥及肥料，^⑧ 其主要成份為石油提煉的副產品，是全球化影響香港農業環境的重要例子；在香港，農夫統稱這些產品為化肥農藥。農業部門負責運作的實

③ 其他土地如魚塘及風水林，除生產食物外，也是村落風水佈局的一部份，見 Sidney Cheung and Tobi Lau, “Socio-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reshwater Fish Cultivation in Inner Deep Bay,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2 (2006): 97-120。

④ 1898年新界成為殖民政府的租借地後，殖民政府進行了土地測量，並在1899至1904年期間完成「新界丈量約份土地測量」[Demarcation District (DD) Survey]，製作土地的 D. D. LOT Number。當地的土地除了政府土地外，也包括私人土地及祖堂地，祖堂地為原居民以祖或堂的名義擁有的共同財產，地權相對私人土地分散；當時沒有人領的土地就成為政府土地。在筆者的田野紀錄中，有機農夫向祖堂租借的土地，租期比較長久穩定，原因是該種土地需要經過所有祖堂成員同意方能出售，導致業權糾紛經常出現，反而給了農夫長期租用農地的機會。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emarcation District (DD) Survey,” October 10, 2018, <http://cadastre.lsgi.polyu.edu.hk/1898.html>。

⑤ 《香港米業概況》（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

⑥ 20世紀初，鄰近的內地地區如南頭及寶安等地已經向香港輸入農產品。HKRS 170-1-636-1, *Agriculture-1. Vegetable Marketing Scheme 2. Establishment of an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1945-1946)*,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HKRS 是指香港政府檔案處中的 Hong Kong Record Series（政府歷史檔案）類別，其後為檔案編號與名稱。

⑦ 1949年，菜統處在市區空投單張，鼓勵居民遷移到新界種菜為生，其中的內容包括：1）「尊敬的農友！1939年的種菜黃金時期已回來，過去三年新界的蔬菜生產逐漸增加，但需求仍然比供應為大。二百萬市民依賴你們的供應，價格的增長支持着你們可期待的利潤。菜統處會促進你們的生產及避免『賤穀傷農』！請不要放棄這好機會，種出你們可以生產的蔬菜。」2）「農友們！蔬菜好價，種菜好過種米！」見 HKRS 170-1-636-2, *Agriculture*, 1946,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⑧ BK006613,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Ventures: Third Report: 8.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60,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BK 是指香港政府檔案處中的圖書館藏品類別，其後為檔案編號與名稱。

驗農場，在戶外環境進行豬、雞和菜等的新品種、技術及科技的試驗；其中，位於上水的大隴實驗農場，直到今天仍積極把各種蔬菜種植技術本地化。在往後的20年，農夫受到農業部門及非官方的嘉道理農場鼓勵，建議農場設置如自動灌溉系統、^{③⑥} 膠製網屋及雨棚等，透過改變微氣候增加作物產量。^{③⑦}

根據農夫的口述資料，雖經歷過科技及種植技術的發展，現在農夫們的生產模式大同小異。一位利用上述技術、投入的農夫可管理約10斗的農場，^{③⑧} 生產過程大致如下：

- 1) 利用鋤頭及泥耙等起壟（即田畦），^{③⑨} 因應選種的作物，壟的長度及闊度有所不同，多呈長方形，逐行整齊排列；
- 2) 決定灌溉方法；^{④①}
- 3) 噴灑除草劑（俗稱草水）或用火槍燒草，去除泥土裡的野草種子及根部；
- 4) 下基肥，從而補充在上次收割後泥土失去的養份；^{④②}
- 5) 下瓜菜種苗：視種子大小，可混合泥土撒在田上，或逐粒放在已由手指或小泥耙挖開的泥洞；有時也會把培植成長了的瓜菜苗移放到田裡。
- 6) 上棚：以竹枝搭成瓜棚，供會長出藤枝的作物蔓延生長，適用於蕃茄及瓜類，方便之後的採收工作；

^{③⑥} HKRS 510 6/1, *Press cutting-Agriculture "Chinese"*, 1979,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③⑦} X1000590, *Hong Kong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Annual Report 1979/80*,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X 為香港政府檔案處中的出版類別，其後為檔案編號與名稱。

^{③⑧} 對於有機農夫而言，他們可打理約二至三斗的農地。

^{③⑨} 在香港，起壟即利用鋤頭、泥耙等工具把泥土蓋成一條條的田畦，方便在田畦上面撒種，農夫多在兩壟中間留有空間，以便站在那裡進行除草、施肥、澆水和收割等工作。

^{④①} 灌溉方法主要有四種：1) 利用水壺澆水，此方法可讓淺根作物從泥土吸收水份，但水份較易被蒸發掉；2) 利用泥土把排水口倒塞，然後引水，進行「浸田」，使田畦充滿水份，讓根部能伸展到較深層泥土的作物長時間吸收水份；3) 在田裡鋪設自動灑水系統，並在田寮設一個水壓器度（稱為水泵），起用管道把地下井水引到灑水系統進行灌溉；4) 自90年代後期開始，一些農夫會在田畦裡鋪設滴管系統，把水注入田畦內，讓土多啤梨、西瓜等對泥土濕度有特定要求的作物吸收適量的水份。

^{④②} 1980年代前，大肥（收集後放置於化糞池、經發酵的人類糞便，亦稱夜香）未被禁止使用時，與雞、豬糞等皆為主要的基肥原料；在此之後，政府建議使用混合化肥配合雞糞，經處理後作為肥料使用。雖然部份轉型有機農夫認為有機耕作是回到過去不用化肥農藥的傳統，但由於有機農業不容許使用大肥，在操作上和傳統有所區別。

- 7) 施化肥農藥：在瓜菜苗成長後，施以兩種極受農夫歡迎、被稱為藍丸或紅丸的化肥，輔以花夫麩及動物骨粉（多是牛骨磨碎），作為肥料；如遇到瓜菜染病的狀況，可到附近的種子鋪，向售貨員說明相關病徵，經介紹後購買針對性的農藥；
- 8) 收成：按照季節及天氣，在下種15至30天後，每天都有機會採收葉菜；瓜果的成熟則需較多時間，有時可經三個月的種植期；有時會聘用鄰居作為臨時工，以增加人手，趕在壞天氣或作物過於成熟（俗稱老身）前進行收割。

在進行收割後，農夫會在數小時內盡快把新鮮的瓜菜運到菜站或天光墟，這個活動統稱為「出菜」。自20世紀中期起，官方正式介入農產品買賣，在二戰前，除墟市外，欄商就是主要的蔬菜中間人，他們除提供蔬菜運輸服務，也經營市區的私人蔬菜批發市場（稱為菜欄）。^{④②} 二戰結束後，政府決意重整蔬菜運銷業務，一份有關蔬菜銷售的報告(*The Report on the Marketing of Vegetables 1946*)提出，快速的經濟回報、糧食自足的重要性及政府的進步形象是政府介入蔬菜批發市場的理據。^{④③} 政府於1946年成立蔬菜統營處（以下簡稱菜統處），以農業部部長為首，根據香港法例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Ordinance* [Cap. 277] 運作蔬菜批發市場。^{④④} 自此菜欄被列為非法組織，新界蔬菜只能經由菜統處的運菜車送到位於九龍油麻地、及後遷至長沙灣的蔬菜批發市場進行交易，^{④⑤} 菜統處在每次交易中抽取11%的金額作為傭金，^{④⑥} 並把部份傭金撥入其農業發展基金，以支持各種和菜農有關的服務，包括改善市場推廣、收集蔬菜、交通、買賣、評級、包裝、貯存、向農夫提供農業補給、向農家子弟提供教育資助，及向農夫提供一些健康及福利支援。^{④⑦}

④② Marjorie Topley, "Capital, Saving and Credit among Indigenous Rice Farmers and Immigrant Vegetable Farmers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179-181.

④③ 殖民地政府發現，欄商的股東大部份為蔬菜零售商，這些零售商能控制欄內交易的菜價，導致零售價往往比收購價高三至四倍，菜農除常常受騙外，也不能獲得如菜籃等任何設備的提供，使生產成本上升。見 HKRS 170-1-636-1, 1946。

④④ X1000632, *Hong Kong Government Wholesale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Annual Report 1949/50*,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④⑤ 根據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Ordinance* 條文，未得農業部門首長的批准，香港市民不能把蔬菜運離新界進行批發活動，在市區只能從事零售活動。法例定義的蔬菜除了瓜和葉菜類，還包括新鮮、曬乾及用鹽醃製過的食用植物。

④⑥ 見 X1000632, 1949/50。

④⑦ 見 X1000590, 1970/71。

農民組織的發展與「出菜」制度密不可分。自1950年代起，新界菜農在主要的蔬菜種植區域組織蔬菜生產合作社，經營菜站以配合菜統處的批發活動，及對農夫進行貸款，並於1953年共同成立新界蔬菜產銷聯合總社（以下簡稱菜聯社），統籌新界菜農的生產及市場營銷支援。⁴⁸ 菜站每天進行一至三次的「出菜」，農夫把菜運到菜站，由菜站聘用的「稱菜」員工（兼任此職的多為該區的農夫）計算菜的重量，進行登記後，菜統處派來的運菜貨車就把一籃籃的蔬菜運送到批發市場。1990年代前，很多菜站都設有早、午、黃昏共三次的「出菜」時間，但由於全港供菜數量下跌，大部份菜站現在只進行早上的「出菜」活動。合作社每年會在菜站舉行週年大會，選出新的理事會成員，並向社員派發糧油及超級市場禮券。

雖然是政府介入的系統，但「出菜」的利潤受到市場供求影響，也和買手與農民的個人關係掛勾。每個合作社在批發市場都擁有一個菜檔，並聘用一位買手，根據菜統處定時公佈的建議菜價，在菜檔和蔬菜零售商進行交易。買手可自行決定是否把蔬菜「倒海」：因形狀、外表、耗損而未能賣出的蔬菜，不會被運回菜站交予農夫處理，而是在當天被菜統處的貨車送到碼頭棄置。一些農夫認為，除蔬菜質素外，和買手的關係，也決定了買手會傾向把誰的蔬菜率先向菜商推銷，誰的菜會被「倒海」。第二天，農夫會在出菜前領回前一天的交易金額。這說明他們既不能決定蔬菜價格，也不能阻止收成被「倒海」，因此受訪的農夫評價這種官方「出菜」制度時，紛紛表示他們通常是被壓搾的一方。因此，非官方的批發渠道一直在新界存在；這些在日出前運作數小時的地方批發市場，被經營內地入境蔬菜批發的菜商及新界農夫稱為「天光墟」；農夫在墟內，多透過其社會網絡爭取更高的菜價。值得注意的是，菜統處及香港政府其他部門也未有積極打擊這些被列為非法的私人蔬菜批發市場，並在90年代後把「天光墟」的經營合法化。

由政府介入發展而來、具有運銷效率的「出菜」系統，以及當中涉及的農業知識與技藝的傳播，是香港蔬菜革命發生的重要元素。過去的研究少有提及當中的細節，本文除了補充這部份的歷史及田野資料，亦帶出農業社群

⁴⁸ 另一個較具規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為港九新界養豬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1950年代後，全港蔬菜供應量一直上升，達到基本供港的目標。在1967年香港暴動時期，有四天是在警察的保護下，新界蔬菜對市區的供應才得以維持，彌補了內地入境蔬菜減少的問題。《香港農友》讚揚香港農夫的貢獻。見 Government Record Office of Hong Kong, X1553-23477, *Hong Kong Farmer* 6:4 (1973):2。《香港農友》是由農業部門於1968至1978年出版的期刊，供農夫們更新農業知識及業界近況。

的結構性問題——「出菜」制度對農夫造成的剝削。在有機農業發展之時，「出菜」制度未能讓新農夫獲得心目中合理的價格，因此他們急需另一套銷售模式。雖然「出菜」制度實質上是一個政策與市場結合的形態，但因剝削的問題，農夫們可以「反思資本主義」的類似想法為口號，吸引對社會現況不滿的消費者加入社群，此問題將在第六節詳述。

五、日漸消失的「耕住合一」農村生活

對遷到新界的農夫而言，他們的日常生活除了出菜，也和地方社會的轉變彼此緊扣。以一個圍繞菜站形成的農業聚落為例，筆者嘗試更具體地呈現農夫的生活面貌。八鄉位於新界中心，地勢平坦，沿錦田河兩條分支發展宗族及雜姓村落，曾經以水稻作為主要的經濟作物。隨着中國政治局勢的不穩，大批移民在20世紀初開始湧入新界及市區，部份人憑藉親屬、工作網絡移居八鄉，租地搭建寮屋及經營農場，有時也佔用政府土地擴展可耕作的農地，生活穩定下來後，亦介紹同鄉、親人前來租地；至1960年代，一些以農業活動為主的聚落逐漸在八鄉形成，在行政上隸屬於原居民的鄉村管理系統。^④

在一個位於八鄉的菜站對面，一些從廣東潮州、東莞等地來的潮州人和客家人，租用原居民的稻田，成為佃農。當時專責新界事務的理民府為方便管理這種聚落，就發放雞舍、豬舍的牌照，讓這些人從事農務，也准許他們在農地上改建部份原為放置農具的農舍作為小屋居住，稱為寮屋；當時寮屋的規格是高度不能超過14英尺、建築物料需為能簡單搭建及拆卸的木材、鐵皮等。由於生活艱苦，農夫的經濟活動極為多元。如在種菜以外養飼豬、雞或白鴿；也有些人是以禽畜業為主，種菜為副；部份家庭成員會出外工作，如從事三行、軍營雜務、菜站兼職及司機等，以換取更多收入；不少孩子自小就要分擔農務。有一對兄弟曾向筆者分享，他們一家在早年經營稱為「燒種」的豬隻飼養生意。^⑤ 通常買家會在晚上把豬籠放在菜站旁的路口，兄弟倆吃過晚飯後，就要一起到豬舍，把豬隻驅趕入籠，用一部小車沿田間小路運到路口，把豬隻放進豬籠，等候買家回來接收。有時候，買家會以在運輸過程中豬隻出現毛病、折肢等理由壓低豬價，對他們來說，養豬並不是能賺

④ 大部份聚落的行政權力隸屬原居民鄉村，地方事務由村代表負責。一些位於新界的非原居民村也可加入鄉事委員會，如八鄉吳家村於1930年代遷入，並在後來加入鄉事委員會。

⑤ 即體型可作為燒豬的豬隻。

大錢的生意。生產者的生活非常刻苦，為了減輕開支，部份人會在家旁的小河找尋食物，如魚、蝦和螺等。筆者田野紀錄顯示在相同聚落中，曾出現的經濟活動超過10種，包括種菜、飼養禽畜、養蜂、食品加工、五金、三行、處理垃圾、士多（零售）和菜站工作等。

自1960年代起，香港整體經濟進入工業化，有了電和自來水的供應，透過政府及農業機構的協助，街燈、信箱和混凝土鋪成的田間小路等設施陸續走進聚落，八鄉居民的生活亦漸漸走向都市化。作為移民的第二、三代，一些農夫的子女有機會到八鄉的鄉村學校接受教育，然後到城市找尋薪水較高的工作；有些家庭透過香港農業和工業發展的機遇，能夠增加家庭儲蓄，合力改善居住環境。在1980年代政府進行寮屋登記後，一些家庭就把寮屋的建築材料改為混凝土，自此在颱風季節時，他們的家園可不再被泛濫的河水沖走。有些經濟能力較好的家庭向地主購得部份土地，豐富了家庭財產。不過，急促的工業化及城市人口膨脹促成新界的新市鎮發展，加上內地在1970年代起實行經濟改革，入境農產副食品數量急速增長，雖然新市鎮發展暫未擴展至八鄉土地上，但由於農業人口銳減，農業面臨衰退。

1980年代後，農地使用權開放，地主紛紛以更高價錢將農地外租作為貨櫃場及停車場等，新界農民未能與之競爭，加上發展商參與丁屋發展，與丁權持有人合作，陸續興建作為私人屋苑的丁屋群，吸引尋找寧靜生活環境及低密度住宅的都市人租買。根據一些豬農和雞農的回憶，當時各大小類型的豬場和雞場為滿足城市人口對食物的需求，進行密度非常高的養殖方式，排放到河道的排泄物倍增，連同其他污染源頭（如家居排放），加上工業重金屬和家居廢物排放，使原本清徹的河水，逐漸變得混濁噁心。政府在1988年強制要求豬農安裝排泄物處理系統，^{⑤①} 大大增加豬農運作成本。1997年後，政府以禽流感爆發為由，以賠償金「鼓勵」收回相關飼養牌照。2006年後，全港禁止散養家禽，1950年代多元化的農業不再復見，蔬菜成為農夫的主要作物，在政府管制下，農夫從農業獲得的收入來源變得單一化。^{⑤②}

1980年代起經傳媒報導的毒菜事件及對健康構成威脅的食品加工成份，

⑤① 1988年，政府推行養豬業界的污水處理計劃，禁止養豬業者直接把未經處理的動物糞便排放到河道，同時政府也引入不同的排污措施。養豬業者認為經營成本大增，紛紛選擇放棄養豬。

⑤② 雖然部份水果，如香蕉、龍眼、荔枝、黃皮及木瓜，在當造時間為農夫帶來收入，但對農場的運作而言，牲口及其副產品（如糞便）帶來的利益和農場投入十分重要，因此農產品的單一化，特別在天氣不佳的時間，對農夫的生計造成很大的影響。

使日漸富有的香港人關注到食物的供應問題。由於他們較為信賴有來源證明的食物，促使超級市場及蔬菜統營處等副食品供應中介者建立可追溯產品源頭的系統。^{⑤③} 部份農夫在農業部鼓勵下，轉營信譽農場，減少使用化肥農藥，也有農夫到內地投資信譽農場，向香港供應蔬菜。對留守香港的農夫而言，農業在那個時候已變成一潭死水，他們不甘心子女繼續付出汗水投入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鼓勵子女離開農田，尋找別的職業。農耕生活對於這些移民的第二代而言，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生活需要，他們憑藉較高的教育程度及城市裡更多的工作機會，逐漸脫離農耕生活，部份更在結婚後在新市鎮租置物業，建立新的核心家庭，不再協助農務。^{⑤④} 老農夫們得到子女們財政上的支持，從「出菜」獲得的收入變成了娛樂（如每天上茶樓）的資本。僅餘的以種菜為生的農夫，卻被社會所遺忘。

「耕住合一」是過去新界農業社群的一個特色。原住民和移民到新界的農夫住在農田旁邊，以方便從事各種農業工作。鄉村的生活成本低，工種亦多，對擁有種菜、飼養禽畜技術的農夫來說，耕住合一是一個合理的生活形態。只是環境的污染及農業的衰退使這個生活方式逐漸消失。不過，從後來的假日農夫及有機農夫的經驗得知，有機農業位於含有豐富生物多樣性、污染較少的鄉郊地方，成為一些都市居民嚮往的另類生活方式，使他們具備反思資本主義帶來的環境污染、都市化、單一生活方式的力量。

六、當一個香港的有機農夫

在都市生活的知識份子，有感於香港以資本主義為本的發展模式，造成

⑤③ 蔬菜統營處在1988年成立快速測試實驗室，抽查在批發市場的蔬菜樣板。參考 AM730，〈建立快速測試制度，保食物安全，魚蔬統營處掌舵人黎國仁榮休〉，2001年5月16日，<http://archive.am730.com.hk/article-56195>。

⑤④ 相對第二、三代的成員，年紀漸長的老農夫在八鄉的社會網絡明顯較強，筆者在2010年參加八鄉大江埔的一次蔬菜合作社社員大會和農曆七月在大江埔舉辦的盂蘭勝會，發現來自聚落的參加者幾乎都是長者。在聚居的情況方面，筆者的田野紀錄也包括個別例子，如前述養豬的一家人維持兒子婚後住在一起、外嫁女兒則與丈夫同住於公共屋邨單位的情況。這一家人在1990年代初期，利用男丁們的收入在錦田市買入材料，兄弟們一起在工餘時間把豬欄改建成小屋，作為婚後成家立室及分戶的一個象徵及新家庭的財產。他們保留屋與屋之間的空地作為共用的空間，並築起鐵閘及鐵絲網，和鄰居劃分界域。由於這家人已不再養豬，老農夫過着退休生活，於屋旁種有少量蔬菜及果樹。在節日時，子女們就回來聚餐、打麻將、燒烤等。

人與自然及人與人關係的割裂，他們想到利用有機農業去推廣另類生活的可能性。八鄉作為香港僅存的農業地區之一，成為這些尋夢者的出發點；早已扎根於此的農夫，為改善生計，加入有機農業。這些人在城市人眼裡，成為具有良心、道德的環境保護運動行動者。農村生活亦被重新審視，成為一種代表生活態度，啟發了正在對抗過度發展的社會行動者。

一群比一般農夫學歷高的人士從西方國家引入有機耕種的理念，作為食物安全跟環境保護的反思方式，並於1988年成立首個實踐本地生產的有機農場「山明水秀田園」，是有紀錄以來香港第一個生產型的有機農場（在此之前有自耕自食的小農戶進行有機耕作），後來改為提供有機耕作課程及假日農田出租予城市人，培育出一批投身有機農業的新農夫。這些在山明水秀田園學習有機耕作的假日農夫，先後決定以全職身份到新界參與農業，自此在香港出現了有機農夫。他們逐漸組織成一個散落於八鄉及新界其他地方的農業群體。一方面，他們各自學習美國、歐洲、日本、臺灣等地的有機耕作概念、技術和市場策略；另一方面，他們定期在各農場聚會，交流實踐心得。

1960年代出生的阿生在小學時離開上水的鄉村，和父母居於九龍觀塘新市鎮邊緣的寮屋區；在成長的過程中，他總是念念不忘新界鄉郊的翠綠山嶺，在中學時期就報讀臺灣的遙距農業技術課程。畢業後，阿生成為工程人員，和家人搬進大埔新市鎮；經朋友介紹，他開始到山明水秀田園當假日農夫，隨後一小塊的農地已不能滿足他對耕種的熱誠，他就向在鄉村長大的友人借用屋前的農地。其後，阿生又租到另一塊農地，利用職業上的知識弄了一個自動灌溉系統，方便日常上班時亦可兼顧農務。2000年，他決定放棄工作，把離職酬金作為投資有機農場的本金，開始全職的農耕生活，其農產品不再只與辦工室裡的同事分享，轉為賣給顧客去支持農場運作。作為一位新農夫，他參與成立有機農夫的組織，透過建立有機標準及公眾教育來推廣他們共同的理念，希望香港社會重視環境保護的活動，和重新反思人與人以及人與土地的關係。

2000年前後，憑藉香港人對健康的關心及內地入境產品受食品安全問題影響其公眾形象的機會，久經掙扎的香港農業社群開始視有機耕作為生存方法。農夫渴望以高品質、高價錢的有機產品獲得利潤。由於香港並未設立有機法例為「有機食品」下定義，不同人士對「有機」的意義及其食品的生產、銷售情況也有不同的見解，提供了可討論及爭奪的空間。在2000年代，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成立並為香港的有機產品進行認證，菜聯社成立有機種植辦公室，蔬菜統營處把有機蔬菜納入銷售範圍，這些肯定了有機食品為一個

新的「食物種類」。一批又一批的農夫紛紛轉營成有機農夫。另一方面，轉營農夫所擁有本地的耕作環境、生產技術和從前亦普遍相似，分別在於「有機」作業為他們帶來高一點的議價能力，借用外國「有機」的元素成為他們在自由市場生存的方法，縱使他們認為和從前未有化學肥料、農藥的耕作情況分別不大。像阿生這種新入行的有機農夫從互聯網、雜誌及書本得到外國有機行業的最新資料，轉營農夫則多從農業機構舉辦的研討會、學習團及職員指導中獲得新知識。

2000年後，以耕作獲取全部或部份生計的有機農夫可分為兩類。第一種是從市區轉移過來的新農夫，部份人在小時候有鄉間生活的經驗，但沒有以傳統常規耕作作為職業，而是從事工程、政府工作、商業、廚師、社會工作等，繼而在1990年代中期前後投身有機農業，期望獲得能討生計的利潤和能為環境保護作貢獻。另一種新農夫則仍居於市區，但亦選擇到鄉村工作，以表示他們對城市生活及工作種類感到不滿；普遍而言，他們對內地的食品安全情況，以及政治經濟制度沒有信心，也在日常生活對工業化食品的安全充滿疑慮，所以在香港從事有機生產。新農夫多是從當假日農夫開始，他們曾經享受在小小一塊田裡種植各樣的植物，和朋友、家人到田裡拔起白蘿蔔後，爭相和大小不一、形狀不規則的作物拍照，然後回家烹調享用。對擁有種植經驗的他們而言，市場上出現的蔬菜的大小、形狀及味道標準化後，並不如自己種植的食物鮮甜美味。於是，他們在農耕班或其他書本上學習有機耕作的理論，並邊做邊學，最後租用更大面積的農地，成為全職或半職的有機農夫，供應農產品到市場。

和筆者聊起經營農場的回憶時，新農夫普遍認為他們在經營農場初期「泥土沒有足夠腐殖質，農夫技術也不夠好」，因此有機菜的賣相實在不好看，影響生意。由於沒有像傳統農夫般飼養家禽作銷售，顧客來源也主要是願意花時間聽他們講解有機菜為何物的朋友、親戚及鄰居，在小眾的支持下，有機農夫經常入不敷支，記憶裡盡是從銀行戶口提款去維持農場運作的艱難時刻。他們堅持這麼一個在當時毫無經濟效益的耕種活動，是出於他們「喜歡耕作」、「喜歡大自然」和「想在城市以外的地方維持一個綠色的環境」。對比傳統農夫常以姓氏為農場取名，有機農夫為農場起名字，不少是帶有「綠」、「苗」、「豐」、「健康」、「樂」等字，代表有機農夫對自然的期盼。經筆者整理，新農夫和傳統常規農夫在背景和耕作上均有分別（見附表1），可作為理解香港農業變遷的一個參考。

起初新農夫並非住在寮屋，他們只在農務繁重的日子，才會留守在放農

具用的田寮或在附近租用的丁屋單位中，否則會和其他家庭成員一同居於市區或新市鎮。每天早上，他們吃過早餐後，就乘坐公共巴士或駕車到田間工作，路程約一個小時。午飯時間，新農夫會騎單車到八鄉或錦田市的茶餐廳用餐，有時候在餐後就去購買種子、肥料及工具等。他們很少參與鄉村的節日和社區活動，^{⑤⑤}也鮮和地主以外的村民打交道，不像傳統農夫和同時居於菜站附近的朋友打麻將聯誼。晚上，沒有駕車的新農夫會趕在最後一班公共巴士停駛前乘車回家休息。此現象在筆者研究的後期有所改變，因為都市的房價增長急速，加上環境愈見擠逼，不少有機農夫租用相對廉宜的寮屋或丁屋單位，以便處理農務，也過着鄉郊生活。

由於未建立鄉村的人際網絡，一些新農夫堅持要和地主簽署合約文本，以保障自身利益。新農夫經常發現他們只能獲得兩至三年的田地租約，而且每次續約時都會聽到地主暗示農地正待價而沽。2008年後，一些社會企業把有機耕作列為服務計劃的一部份，^{⑤⑥}在獲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可以負擔較高的田租，新農夫埋怨這些「本來是做好事」的新服務，把平均租金由每年每斗港幣數百元提高到1,400元以上。^{⑤⑦}大部份新農夫都不敢貿然增加農場的基礎設備，害怕被地主要求搬離農田時搬運費過高，甚或因未能搬走某些設備而造成財物損失。

在田野研究期間，筆者鮮少聽到有機農夫佔用政府土地種田，他們也缺乏資金買下正在耕種的所有田地，因此被要求搬遷農場的情況常有發生。^{⑤⑧}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收地發展基礎建設，使田主獲得農地賠償，佃農也要結束耕作。因為政府在土地徵收時會派人計算農場內種植的樹木品種及數量以確定賠償金額，一些田主不喜歡新農夫種樹，以免出現有關農田資產的爭端；甚至有些田主看到農夫種樹時「見一棵斬一棵」，免除後患。不過，在有機業界中，由於水果是較為高價值的產品，新農夫也知道土地徵收時從果

⑤⑤ 在2010年度八鄉大江埔的盂蘭勝會中，筆者觀察到兩位在大江埔耕作的新農夫捐款後，其名字被寫上金榜，負責勝會的主會和僧人，在會期中為捐款者祈福。但是，這兩位新農夫並沒有在會期最後一天所有會員（包括一位筆者認識的轉營農夫）都會參與的祭幽儀式中出現。筆者推測這兩位新農夫並未成為盂蘭勝會的會員。

⑤⑥ 香港政府在2006年推行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社會企業計劃，一些社會福利組織透過該計劃，讓服務對象從事生產及銷售有機菜。對有機農夫而言，雖然這些計劃增加了一個供菜對象，但農地也因需求增加而租價提高。

⑤⑦ 本文以港幣為貨幣單位。

⑤⑧ 2011年，筆者聽說有人選擇購買部份農地加上租地，作為戰略性的部署，降低整個農場被收購的機會。

樹獲得的賠償會較瓜菜為高，如果田主不太理會農場情況，他們會特意種一些果樹，一舉兩得。另外，一些新農夫曾與筆者分享有關農夫被有意發展土地的地方人士騷擾的謠言；一位筆者認識的農夫就因為被別人傾倒泥頭和垃圾在田裡，以致農場受污染，只能找尋別的農田繼續其有機耕作。

農夫的身體狀態呈現他們和農場環境的互動。一般來說，新農夫穿上襯衫和長褲工作，在強烈的日曬下，帽子和太陽眼鏡對農夫非常重要；他們也會穿起雨靴，既方便在濕潤的泥土上活動，同時避免腳掌被田裡的硬物刺傷。筆者目擊傳統農夫赤腳就走進田裡，他們覺得雨靴太重了，不能靈活地在田間活動，從都市來探訪農場的人不能理解這種人和土地的親密接觸。另外，女性新農夫在皮膚顏色和體型上都和都市裡辦公室上班的女性不同，她們沒有長期使用化妝品的習慣，也沒有刻意進行減肥運動，皮膚比較粗黑，手掌的皮膚也比較粗糙，而且手腿的肌肉也較結實；這種外型頗受筆者認識的有機菜消費者欣賞，說「女農夫不會害怕日曬雨淋的工作環境，有着與眾不同的美麗」。

農場管理是一個風險、質素及成本的學問，無論是否從事有機耕作，農夫們會利用全球及本地提供的資源去經營其農場。農夫的工具包括耙、鋤頭和塑膠菜籬；也會用上一些循環再用的小鐵罐去盛載種子，存放於冰箱以保持種子的質素。在香港，種子店以約20元的價格賣出一把鋤頭，有些農夫為節省成本，會在回家鄉探親時在內地購買農具（如價值二元一個的鋤頭）。他們也會幫一些較為相熟的農夫帶工具、磅或種子回來。可是，他們都會對筆者說，內地製造的工具一般都很易破爛，相對10年前，這些工具的壽命大幅減短，種子的發芽率也低於在香港可買到的同類貨品。對缺乏農耕設備的新農夫而言，從漁農處租用或購自二手市場的犁田機對他們很有用，特別是夏天野草生長特別快的時候，可以時開動此機去清理農田。由於全新的犁田機（又稱耕耘機）在香港售價是20,000元，在內地則售4,000元；其他設施如雨棚、溫室的物料，農夫認為在內地購買這些高成本的設備比較划算，因此一些有機農夫會組織起來，由一人負責到廣東統購回港，再攤分運輸成本，這也成為2010年一個有機農友組織成立的其中一個誘因。新農夫會養貓狗去捕捉偷吃番薯的田鼠，及趕走晚上趁農夫回家後前來偷菜的賊人。

由此可見，有機農業並非脫離香港農業的發展脈絡。除了帶給本地社群一個新的農業分類外，農夫在生活方式的選擇、成本的考量及農場的管理，都受到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及文化因素影響。這些考慮，既與 Göran Aijmer 在1970年代的討論一脈相承，同時也反映新農夫的出現，以及外國有

機理念的引入，並未改善香港農業的經營條件。因此，有機農業的出現，雖然為本地農業續命，但農夫們依然苦苦掙扎。

七、有機農業嫁給社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為了進行有機理念教育及推廣有機菜消費，新農夫和農業機構自1990年代中期起進行了整合。新農夫一般認為，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及2006年的超市毒菜事件是消費者轉向有機消費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尋找市場是新農夫最為頭痛的問題，同時亦成為他們組織起來的一個契機。初期，香港農夫種植出來的有機蔬菜在市場上別樹一幟，消費者認為這種產品的質素參差不齊、佈滿蟲洞。這樣「天然」但賣相差勁的蔬菜，在正價時卻比常規菜昂貴近三倍。新農夫在1994年起就在山明水秀田園職員的組織下，定期到各農場交流，又分別到內地及國外搜集有機耕種的情報，回港和各大人分享。

新農夫起初不屬於蔬菜供應系統，他們需要想办法讓有機農業佔有一席之地。1999年以前，新農夫「出菜」，菜統處只會把有機菜當成一般蔬菜出售。新農夫要自行找尋顧客，才可擺脫受制於菜統處因應市場需求而定立的菜價。要在菜統處的系統外進行本地有機菜的推銷不容易，新農夫們回憶當初的辛酸，認為1990年代時有機和常規菜在批發市場的售價相同，是由於政府不理會農夫對環境保護作出貢獻。1999年，新農夫、山明水秀田園及嘉道理農場一同成立香港有機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協會既組織有機節，參考外國資料來制定有機標準指引，又聯合一間大學向農業發展基金申請撥款，成立有機認證機構，促成政府及半官方農業機構包括菜統處及菜聯社等對有機耕種的認同及發展。例如，2005年，菜聯社、嘉道理農場及協會在位於大埔新市鎮的菜站合辦一個假日有機農墟，協助有機農夫把收成直接向客人銷售。2006年後，消費者對食物安全及健康關注與日俱增，有助有機菜的銷售。

協會作為一個新出現的農業組織，為香港帶來一批新的農業精英。一些農業部門辦的展覽及活動、坊間有關環境保護和有機耕作的講座活動，都會邀請協會的成員擔任嘉賓或講者；傳媒紛紛報道訪問新農夫，了解他們對回歸田園的想法。這些舉動，既使協會的知名度提升，也協助新農夫開拓市場。為了讓外界理解有機農業為何物，協會進行一系列的推廣工作，並以本地生產作為達到有機生活的最理想方式，其解釋為：本地生產有助於食物里程（即交通往來）的減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買賣關係和溝通（如雙方可透過農墟和探訪農場等場合見面），使雙方追求公平及重視互惠互利的交

易過程。協會舉辦的活動以本地有機農夫為服務對象，如有機農墟、有機晚宴及有機節等活動，可促成消費者和農夫的面對面交流。部份消費者主動組織起共同購買，即把同屋苑、公司或同區的消費者組織起來，利用社區組織的資源或共同承擔運輸費及行政費用，每週向數位有機農夫集體訂購蔬菜。根據田野紀錄，自2003年起，香港約有十多個類似共同購買組織先後成立，當時在有機業界就出現了「當農業嫁給社區」的說法，代表農夫和消費者直接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圍繞本地有機蔬菜而建立的社群。^⑤

縱然面對艱難的經營環境，新農夫阿生和一個位於大埔的共同購買小組依然保持互相支持的長期關係。阿生在擔任協會農耕課程的實習農場導師時，認識一位共同購買的義工，並在2004年接受該義工邀請，每週為共同購買小組供應蔬菜。對於小組而言，他們找到可以信任的本地有機農夫，並透過探訪農場及在農墟和農夫會面，進行面對面溝通，從而確保日常食用的蔬菜是安全的；當時，只有像阿生這種經營小型農場的農夫才願意和他們合作。2008年的夏天，由於天氣不穩定，獨力打理農場的阿生不能兼顧農墟及共同購買兩方面的需求，遂把共同購買方面的供應暫停。小組成員等待一年後，阿生利用供應菜包方式為小組供菜，即把農場可供收成的種類混合在菜包內，訂戶在提取菜包時才知道裡面包括有什麼，這對於常在超級市場及濕街市（即菜市場）挑選不同貨品的消費者而言，是一種很新穎的消費方式。阿生曾提及在農墟市場日漸成熟的時期，共同購買的功能看起來不再明顯，共同購買小組願意改變合作方式，接受菜包這種形式的交易，對小組成員來說，是他們延續對阿生這種有良心的農夫的支持。至2011年，筆者每次和小組組長了解小組的近況，組長都表示堅持小組理念是要支持像阿生這種為了延續新農夫的理想、一直小本經營農場的農夫，因為他們在生產蔬菜的同時，也為消費者的食物安全和自然環境把關，組員體諒農夫面對的困境。

這種強調人際網絡的買賣關係，主要標誌着本地食物與全球食物系統的分別，也透過選擇有道德、良心的農夫來界定有機食物的原真性，同時配合本地消費群對有機菜的接受程度。根據農夫的經驗，香港的有機蔬菜消費者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只在較高檔次的超級市場購買外國空運來的有機菜的人；第二種是會在農墟尋找本地有機菜，但又不抗拒購買經濟上可負擔的認證有機菜的中產階層；第三種是專門在農墟快關門時，到場議價，遊說農友

⑤ 江瓊珠，《從三斤半菜開始：重拾久違的真味與真情——社區為本有機農業的感人故事》（香港：進一步出版社，2006）。

割價售出剩餘蔬菜的人；第四種是會特意來農墟和農夫交談並買菜，又認同共同購買小組訂購蔬菜的理念的人。在絕大部份生產者追求產量的提高、市場希望以最低成本獲得營養時，新農夫選擇了堅持一種價格高、成本效益較低的另類生產及銷售方式。^⑩ 他們以食物里程短的本地新鮮食物（有些產品是即日採收）、食物安全及減少碳排放作為賣點，加上以時令蔬果不需要過量農藥為由，希望顧客能不時不食，改變其受全球化影響而形成、認為食物總是隨手可得的飲食習慣。為了合理化有機農產品的價錢，新農夫們組成新的社群表現出其獨特的「道德」、「本地」形象，從第四種消費者開始，找尋更多支持農夫的顧客。透過把本地食物、個人健康和全球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緊扣起來，有機農夫成為友善地聯繫自然和社會的中介者。因為對原有的「出菜」系統的不滿，有機農夫創造了一個標榜良心、健康、食物安全及人際關係的另類市場。

八、有機食品原真性及認證的中港政治

筆者在2008年參與一個由農業部門舉辦的有關有機士多啤梨種植技術的講座，在講座後，兩位農夫為了誰有更高「有機標準」起了爭執，他們在作物生長環境、個人操守和農藥等選擇上呈現不同意見。這情況在筆者的田野研究期間屢見不鮮，引發謠言、爭執的事情，多是有關誰在生產「假」有機菜的疑惑。這個牽涉到原真性的問題，是基於有機菜和常規菜在外表上沒有明確的分別：從西方科學的角度看，同一類的蔬菜，不管是否有機，其化學結構經化驗是相同的，因此認證有助消費者分辨出什麼是有機菜。但有機農夫常常對筆者說，他們能透過肉眼觀察、嗅覺或進食，分辨出那棵是否有機菜。這是從農夫對蔬菜生產的經驗累積出來的知識，並非一般消費者可以做到。^⑪ 新農夫認為有機菜的原真性，在於有機農業是一個良心工作，即有機

⑩ 常規菜在當時平均每斤四至六元，在農墟，本地有機菜則售每斤16至24元。後來，菜聯社成為該農墟唯一的組織者。不過，在2005年後比較大型的超級市場可見內地入境的有機蔬菜，售價約為每斤24元。自2008年起，本地生產的有機蔬菜約為每天三至四公噸，內地入境的有機蔬菜則為每天二公噸。在超級市場可見出售外國、內地及本地經菜統處的有機蔬菜。一些有機食品店漸改進內地有機蔬菜，以求相對穩定的貨源。本地有機蔬菜的供應及賣相則被認為受產量及雨季影響。

⑪ 有農耕經驗的消費者曾向筆者解釋兩根玉米的不同甜道，並指出哪兩個農夫是生產這兩支玉米棒的共同購買小組成員。這種知識多是從農耕中獲得，再在小組中口頭傳播。

農夫應該種植「良心菜」，不能欺騙顧客，銷售假的有機菜。這正構成有機業界對「從田野到餐桌」整個過程的重視，也把生產者和消費者連結成為一個有機農業社群。

自香港出現本地的有機認證後，有機農業業界出現制度化的現象。2004年，農業發展基金資助一所大學成立有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舉辦有關有機耕作和消費的教育活動；該大學也以公司（下稱認證公司）名義，展開對香港農場的有機認證工作，^② 由受訓的全職及兼職調查員到訪申請認證的農場，抽取泥土、水源和蔬菜樣板（普遍稱為泥板、水板和菜板），撰寫農場環境報告，交回公司，由公司職員、科學家、學者、環境保育人士及農夫代表（協會代表）組成的認證委員會進行認證審核。參與農業部門有機支援計劃的農夫可以為農場申請或延續其有機認證，一般個人經營的農場須付的認證費用為1,000元，有機支援計劃則資助9,000元；如果農夫經營的農場是在荒廢的田地上，經審核後農場可獲得有機認證；但從常規耕作轉作有機耕作、曾作養豬場及沒有完整文本耕作紀錄的農場，則要經過一至兩年的轉營期，才能經審核成為認證有機農場。菜統署自2007年起，要求有機農場先獲得有機認證，方可把作物以有機菜的名義出售到該署，經由優質蔬菜部向超級市場、酒店、政府部門銷售。這些蔬菜的平均收購價為每斤二至八元。農夫們表示，他們在農墟為同類蔬菜標價每斤16至20元，生產成本則約為12元，因此，參與農墟的有機農夫只在產量過剩、銷售無門的情況下，才會利用菜統處的銷售渠道。

對認證機構和農夫而言，認證過程是對有機耕作的重新定義。有機認證的出現幫助市民認出在超級市場、有機農墟及食店售賣的本地有機食物，市民不用親身到農場或細讀其他科學報告，就能以有機認證及標籤作為貨品是否有機蔬菜的標籤。對中心而言，這是市民識別「真正」有機蔬菜的最佳方法。不少農夫對認證的標準卻一直抱有懷疑，覺得認證人員雖有標準可跟從，但他們對農夫面對的實際耕作環境不了解，加上不是務農或讀農業學科出身，在耕作知識上不能與有經驗的農夫相比。部份農夫認為認證標準和認證人員對耕作的理解有時很荒謬。例如，公司要求一位農夫設立一個寬度兩米的緩衝區，並用鐵絲網包圍農場，貼出告示，寫上「有機農場，請勿污染」，以阻止鄰近的居民的化學排放及垃圾滋擾。他認為在香港農場與農場

② 另一間在香港註冊的有機認證公司，為內地的農場、高爾夫球場及少數香港有機農場進行認證，因資料所限，本文不另作描述。

距離很近，這種措施的確顯示了有機農夫的決心和意識；但緩衝區內的作物不能以認證有機菜的名義出售，大大減少了農夫的種植面積，雖然獲得認證，但收入也隨之減少。另一位農夫則留意到一些認證人員常常單以肉眼了解農場操作，對他而言這是不科學的；有一次，一位認證人員告訴他，農田旁邊的鐵皮屋在雨天滲漏出來的水，可能對泥土造成化學污染；他認為對比他以更科學的方法理解耕作環境，如種植花生等固氮植物提升泥土的微生物活動及養份，促進整個生態系統的生產力，認證人員提出的問題實在微不足道。有機認證標準對這些農夫而言，是理論上的守則多於有助農夫耕作的知識。

雖然協會有份參與建立有機認證公司的過程，但對新農夫而言，他們並不想因被認證限制他們的農業環境。一些新農夫在中心成立前已經營農場，但他們被公司要求證明他們在進行有機耕作，並提供詳盡記錄，農場才可跳過轉營期，直接成為有機農場。對香港的農夫來說，填寫農場紀錄及整理購買種子、有機農藥等單據是費時間、耗精神的工作，他們情願把精力及時間留在田間，但認證過程卻滋擾到他們。有些農夫只好接受公司要求，成為「轉營」農夫，一年（或透過僅有的紀錄獲得縮減轉營期）轉營期結束後，其農場才能獲得有機認證。

一些農夫希望市民不要只信任認證，他們認為拒絕申請有機認證是有機農夫對新制度的抵抗，也有助建立有機菜作為良心菜的形象。從2008年起，菜聯社要求有機農夫需擁有有機認證，方可繼續在大埔農墟賣菜，有個別新農夫選擇離開大埔農墟，到其他農墟賣菜，例如每逢星期三及星期日舉辦的天星農墟，主辦單位包括協會及嘉道理農場，就不需要有機認證，它們依靠職員親身了解農場情況，以及農夫進行「自行認證」，憑良心及行動來實踐他們的有機理念；這些單位在其他地方辦的短期農墟，亦為沒有申請有機認證的農夫及其產品，提供面向消費者的平臺。

有機認證對轉營到有機耕作的農夫而言，卻是一個改善生計的資源。自2000年起，農業部門正式把有機農業列為其工作項目之一，公佈了相關的操作守則，推行支援計劃，協助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的常規農夫轉營成為有機農夫。菜統處為配合有機菜作為「新」商品，^⑥亦利用其優質蔬菜部的資源，

⑥ 2000年以前，菜統處把有機菜和常規菜當作同類貨品；有機支援計劃開始後，農業部門以八鄉的吳家村、大江埔、十八鄉的逢吉鄉及打鼓嶺坪輦為計劃的示範區，參與計劃的農夫獲發橙色膠菜籠，菜統處的運輸車也會設定有機菜場的收集路線，每天前往各地點收集有機菜。部份農場不位於示範區的可有農夫表示，如果他們想「出菜」予批發市場，須先致電預約，往往由於交通問題，不獲協助。

如冷藏庫、蔬菜包裝中心，協助參加支援計劃農夫的有機菜賣到超級市場、酒店等被農夫視為「高檔」的地方。菜聯社於2004年成為負責有機農業的辦公室，在農務方面協助參加支援計劃的有機農夫，包括育苗、訂購有機農藥、肥料及借出小型機器等。2007年，有235個有機農場已經登記成為有機耕作計劃成員，至2008年中，53個農場獲得認證及一個刻有農場名稱和認證號碼的鐵牌，部份農夫會在農場接近大路處豎立該鐵牌，供遊人認識。^④ 2018年，獲有機認證的農場總數為133個。^⑤

轉營有機農夫會靈活運用有機認證制度，從而增加收入。阿梅是一位轉營農夫，她在東莞經歷過「大鑊飯」的歲月，^⑥ 1970年代偷渡來到香港，投靠元朗的親人後於工廠工作，透過親友介紹與其丈夫相識，婚後定居於八鄉吳家村一間寮屋，閒時在屋旁的農地上種少許瓜菜。可是，由於內地改革開放，工廠北移到珠三角地區，阿梅被迫離職，當上農夫，但「當時已經過了農夫也可以賺錢的時候」。1990年末期，阿梅跟隨其他吳家村的農友，成為農業部門試驗有機耕作成效的第一批農夫。他們參觀超級市場，眼見「外國人不用考慮價錢就把一包包比本地菜昂貴很多倍的外國有機菜」放到手提籃裡，就決定試種有機菜，以為可以帶來比較好的生計。她記得進行轉營時，她要遵從很多規矩：不能下化肥農藥，首三批農產品不能當成有機菜出售，每天也要請識字的丈夫為她填寫田野日誌，記錄下種、肥料和有機農藥的種類和份量。農業部門的職員會來農場作定期巡查，一年多後，阿梅才獲得菜統處分派代表裡面裝的是有機菜的橙色塑膠菜籃，可以向菜統處供應有機菜。可是，由於愈來愈多轉營有機農夫出現，有機菜供應量逐年上升，菜統處和傳統菜的收購價距離愈來愈小，阿梅發現有機農業的現實並不如想像。阿梅把每週兩天的時間投放在有機農墟上，坐在農墟學習從前不需要的銷售技巧，向顧客解釋種植環境、產品的不同營養和藥效，甚至學習用磅「稱菜」，才可在農墟獲得比菜統處的收購價高三至四倍的菜價。她認為現在的有機耕作相對從前「出菜」，算是在「經營生意」。雖然工作時間多了，但她認識了一些有機農夫，可以交換種子、農場情況及知識等。其後，她加入協會，是首批成為協會委員的轉營有機農夫之一。

④ 部份不滿有機認證制度的新農夫在獲得有機認證後，並沒有把鐵牌展示出來。

⑤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獲認證單位名單」，2018年10月18日，http://www.hkorc-cert.org/tc/service_list.php?cid=19。

⑥ 「大鑊飯」是指20世紀中期實行的人民公社。

認證制度出現後才加入業界的有機農夫又如何能在市場活躍呢？筆者嘗試從住在粉嶺新市鎮的新農夫阿芳的例子中一探究竟。阿芳的父親是一個中醫師，她也有採購中草藥的經驗；她育有兩個孩子，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期間，她經常帶着孩子遠離較易受病毒感染的市區環境，往粉嶺的小山坡走走，享受大自然。她看到農夫的務農生活，覺得他們「在享受生活」，就慢慢向當地的原居民打探，租用田地栽種較高經濟價值的沙律生菜。透過朋友介紹，她開始向在鄰近醫院工作的職員供應有機菜，也逐漸找出自己的市場定位，就是利用其中醫藥知識，種植藥用作物，同時向客人推介食材的烹調方法。阿芳參與有機支援計劃，亦會訂購菜聯社的菜苗及種子；由於她常常參與農業部門的講座活動及市場推廣學習計劃，和農業部門的職員關係不錯，有時會從部門獲得一些在市場上較少見的有機作物種子，進行試種及試賣。由於她的客人以和她直接交易為主，她沒有申請有機認證，她也認為沒有必要付錢「買太和農墟的入場券，因為客人信的是人不是認證」。她在2009年才首次出席協會舉辦的短期農墟，吸納一些新客人。不過，在一次聖誕節前，來自醫院的客人訂了沙律生菜，但最後因故放棄購買；由於共20斤的生菜快變得過老，必須收割；阿芳請求菜統處的協助，由於沒有有機認證，她不能把菜作為有機菜出售，為了能以每斤十多元以上的價錢賣出產品，她只好致電其他客人，逐一遊說後，才把菜賣出。

農夫的個人操守影響了他們能否持續地運用「認證有機菜」的名義進行蔬菜賣買。大埔有機農墟規定，農夫不能出售非其農場出產的農產品，有農夫曾因在農墟攤位內擺放當天因故缺席的農夫朋友的蔬菜，而被逐出農墟；農夫之間更厲害的謠言是部份農夫操守不佳，把來自內地的常規菜當作本地有機產品出售。例如，在夏天時，因受華南炎熱的天氣影響，農夫一般難以種出較受顧客歡迎的葉菜、番茄類作物，但有少數農夫卻把上述產品「一籮一籮」帶進農墟，除受顧客歡迎外，更引起其他農夫懷疑「他們怎麼懂得變魔術」。農墟的組織單位很難處理這種謠言，筆者也在一個農墟裡看到有農夫能在夏天出產賣相甚佳的白菜，其他在場的農夫解釋，該農夫經營的農場位置十分通風，減少了蟲害，該農夫「有經驗、有技術，每天也在田裡工作到晚上」，能在雨棚下種出白菜，是他值得的收穫。由此看來，農夫平日的形象，和其他農夫是否相信其耕作技術有關。

在香港法例上，認證有機菜受到監管。中心自2008年起，在其每年舉辦

的有機消費推廣活動中，公佈濕街市菜檔售賣有機菜的調查統計，^{⑥7} 該報告把有機菜分為兩種：1)「聲稱有機菜」，即一些未經認證的有機菜場和商販，在香港沒有有機法的情況下，仍可稱其產品為有機而不觸犯法例；2)「認證有機菜」，如商販註明了出售的產品經過有機認證，就算是認證有機菜，如出現任何商販或農場造假的情況，經市民投訴後，香港政府的海關單位可以商品說明條例對其作出檢控。

除非有人目擊並投訴於農墟謠傳的魚目混珠事件，否則農墟組織者及認證公司難以跟進和處理謠言。有一次，傳媒揭發一個大型有機農場的農場經理到批發市場收購蔬菜，當作認證有機菜出售，由於有相片為證，該農場被褫奪有機認證。

下述的一場認證內地入境有機菜的風波，反映香港有機農夫對食物安全、身份認同及市場的危機感。作為消費者，支持本地農業的人很快看出其實際問題，就是有機產品種類單一及其供應量不穩定，因此在超級市場可購買進口有機食品，以彌補他們生活上的需要。相比價錢高昂的外國有機產品，內地的有機產品價錢較大眾化，但由於內地食品形象不佳，香港農夫及消費者都對其有機成份有所懷疑。在內地，農產品安全受政府的法例及規定監管；自1987年出現有毒蔬菜的問題後，政府率先推動有機生產，環境保護部門發展有機農業，農業部門則以綠色食品為其發展方針，限制生產者投放的化學肥料、農藥、添加劑及其他有害人體及生態的物質，^{⑥8} 在分類及標籤上最高等級為AA級，即和有機生產提倡的無化肥農藥的標準無異。在中國有機法例下，所有在包裝上標籤為有機的產品都先要獲得有機認證，使全球的消費者透過認證標籤購買安全的中國食品。^{⑥9} 不過，在現於內地推動有機農業的前協會會長眼中，有機和綠色食品的認證制度是為了配合大眾消費及

⑥7 筆者曾參與中心舉辦的一次濕街市調查，以顧客身份到一些菜檔了解有機菜的售賣情況，大致上，菜販會以三種形式出售產品：1)在發泡膠板上標明「有機」及售價，放在產品上；2)把合作的有機農夫的認證副本貼在當眼位置，聲明該菜檔出售認證有機菜；3)發售貼有其他認證標籤、經包裝的有機產品。從中心角度看，只有後兩種才是認證有機產品；菜販應該把常規菜、聲稱有機菜和認證有機產品分開擺放，以免出現污染情況。

⑥8 China Green Food Development Center, "The Concept of Green Food," 20 June, 2008, http://www.greenfood.org.cn/sites/GREENFOOD/List_3675_3812.html.

⑥9 中國有機食品市場交易額在2003至2008年上升10.9%，達到64億美金。中國佔有亞太地區62.5%的交易量。Amon, *Organic Food in China Industry Profile* (London: Datamonitor Plc, 2008).

出口模式而存在，中國的有機農民卻要自行決定是否接受認證或是以不同於有機的名義出售貨物，以適應自上而下、成本高昂的出口及認證系統。^⑩

2008年前，在香港可見的中國有機食品多以乾貨、加工品出現，包裝上都印有中國、美國及日本等地的認證標籤，即認證公司到生產或加工者進行認證後，准許在包裝上印上其認證標籤。在大埔有機農墟，商販不能出售外地或內地入境的新鮮蔬菜，一位商販就售賣本地沒有出產的內地有機加工品，如乾菇、豆類和米類。該商販認為，雖然內地食品安全問題令人憂慮，^⑪其實也有具有道德、良心及注重食物安全的農夫和食品加工者。當該商販親身到訪合作的農場及加工場後，更覺得有品質堪比產自臺灣、日本等地的同類貨品；內地的貨品售價也較為便宜，可和本地有機農業相輔相承，因此決定專門從事這個引進生意。在農墟內，該商販就整天向顧客費盡唇舌解釋產品的來源和製作過程，消除顧客因內地食品安全問題引發的疑慮。^⑫

內地的新鮮有機菜則是通過超級市場及近年出現的有機專門零售店等渠道進軍香港。2011年前，香港可購得的中國認證有機菜，都是由香港農夫在廣東開設的兩個前信譽菜場在轉營為有機菜場後生產的，兩個農場都獲得中國及國際有機認證。^⑬這種菜場在本地有機農夫眼中是可疑的，他們曾跟隨菜聯社到訪這些農場，看到有些菜苗被「刻意」種在花盆上，他們認為這樣可能有農場工人在花盆裡的泥土「動手腳」；也有農夫說到訪當天沒有見到任何菜蟲，這在有機耕作的理論上並不合理；他們還留意到，在香港超級市場銷售的中國認證有機菜，部份並不是時令蔬菜，如夏天出售的番茄，使

⑩ 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日的一個公平貿易嘉年華內，一個攤位出售一種來自內地的產品，名為「良心米」。負責人介紹，生產者雖以有機方法種植稻米，但因不能負擔有機認證的費用，未進行有機認證，於是用「良心米」作為產品名稱。攤位負責人引入該產品，就在嘉年華內以展板形式向在場的顧客講解生產者的耕作方法。

⑪ 前述從事「良心米」銷售的公司負責人，甚至安排前往內地的探訪團，讓顧客了解內地的食品生產情況；她認為這是一種跨內地與香港的共同購買及為社區支持農業模式，藉此支持內地具有良心的生產者。

⑫ 一個共同購買小組曾引進來自臺灣一個佛教團體兼營的有機加工產品，因小組組長及幾位組員也是該團體的信徒，認為團體理念和行為都使產品值得小組成員信賴。2007年，因加工食品的生產線被搬到內地，小組決定取消訂購活動，組長解釋，因他們不能監察內地的生產情況，無法為組員把關，為減輕風險及責任，故作此決定。

⑬ 一位在菜統處工作的職員告訴筆者，2004年以前的香港幾乎不存在有機中國菜產品，之後，該種產品在超級市場陸續出現。2008年，一款在超級市場出售的有機菜心售價為每斤36元。

他們質疑同屬華南氣候的廣東和香港怎能生產出不同的新鮮農產品。中心主任認為，這些菜場獲得國際級的認證，在嚴密監管下，農場記錄難以被動手脚，因此作為認證有機菜，香港的農夫應該同意內地入境有機菜能擴大市場需求，有助本地有機農業的發展。

認證公司在2008年打算到內地進行認證工作引發的農夫反抗事件，突顯香港有機農夫對內地入境有機菜的疑慮。在6月舉行的一個健康食品展覽會後，到場擔任講座嘉賓的中心主任告訴筆者，農業發展基金只能當作公司的短期財政資源，加上香港有機農場數目增長放緩，^{⑦④} 公司和中心要長期運作，需要建立更多認證模式，如有機魚場的認證，及到內地進行菜場的認證；香港農夫在內地運作的有機菜場面積相對較大，因此公司可以從認證工作中，獲得更大利潤來支援中心的教育、推廣計劃。他的建議是，只容許內地的菜場認證一些香港農夫沒有種植並作銷售的種類，如米和橙等。

這計劃在該年9月遭到香港有機農夫的群起反抗。中心主任和有機農夫們在錦田的一間茶樓進行一次有關公司應否到內地進行認證的會議，約有30名主要在八鄉及錦田耕作的有機農夫參與。一位名叫阿同的農夫在這該會議前主動擔任組織者，在大埔有機農墟裡收集農夫簽名，聯署反對中心的建議，該聯署的內容提出香港農夫對內地有機菜場的不信任，以及對內地引進有機菜對本地農業造成的衝擊：

一個香港只有一個認證（公平競爭），……一個標籤不能區分香港農夫的產品與內地來的產品的成本與質素，……有機資源中心應在進行內地認證前諮詢香港農夫，……[而不]是以自由貿易為名偷走香港菜的優質品牌。……內地的農場是由商人經營，香港農場則是個體戶，一個社區是需要農業的，……我們有可能再次重蹈[農業部門的]陷阱（信譽農場計劃）。

一個老農夫在會上道，當年農業部門鼓勵他們轉營信譽農場，以減低化肥農藥及增加產品品種的策略與內地入境菜競爭，但幾年後，農業部門卻和

⑦④ 2008年登記有機支援計劃的轉營農場共114個，正在申請及已獲得認證的（包括新農夫的農場）為80個。每個認證為公司僅帶來每年數千元的收入，而且主任預計未來數年只有每年不多於10個受政府鼓勵、退回牌照的養雞及養豬場會轉營為有機菜場，因此申請認證的農場數目增長勢必緩減。

有資本到內地經營農場的香港農夫合作，擴展信譽農場系統到內地，以增加供港蔬菜的數量，結果本地菜價不升反跌；當新品種超甜玉米引入香港，香港農夫在收入稍有提升後，內地的信譽菜場立即把此品種進行量產，並引進香港，打垮香港農業；他認為香港的農夫們不想剛剛藉着有機耕作而漸入佳境的香港農業，被內地入境有機菜趕盡殺絕。新農夫阿生則說，香港的農場在人力和土地供應上不能和內地有機菜場競爭，如果內地菜場身在遠方而不利於公司常常進行監察，卻又擁有和本地菜場一樣的有機認證標籤，這種做法對本地農夫並不公平；出現和內地入境有機菜相關的食品安全事故時，會嚴重傷害本地有機菜在市場的聲譽和有機農夫的生計。^⑮ 由於有機農夫們對中心主任的建議反應過於強烈，公司決定放棄到內地菜場進行認證工作。

另一個例子更能顯示本地有機農夫對內地出產的有機菜有所抗拒。筆者在香港的有機農墟及共同購買小組曾遇過內地空運到港的有機菜，這些產品由一位在香港進行有機種植多年的農夫到內地開設有機菜場，再把農產品空運回香港，主要供應酒店和餐廳等。筆者除經常到該農夫設在八鄉的農場進行田野調查外，也曾於2011年跟隨該農夫到訪其位於雲南的農場。在十多年的農場經營生涯中，這位農夫先在八鄉以農場經理的身份管理工人，在香港供應有機菜予其他農夫口中的「高檔客」，包括私家醫院、酒店和連鎖餐廳等，使該農場成為全港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有機農場。在2008年一次訪談中，他評價內地是一個容許農夫唯利是圖的地方，很多人為了賺錢可以不擇手段，例如一些農場把排污渠裡的水作為灌溉用水，方便農場運作。所以，當他開始在內地投資開設農場時，會找一些位置較偏遠、農場不會受到河流上游污染的地方。最後，他在雲南的郊區開設一個農場，由於該地區四季如春，對各種瓜菜的生長十分有利，他得以持續種植受香港顧客歡迎的有機蔬菜，以空運方式輸入香港。有一段時間，他在香港經營的農場會在一個有機農墟擺攤賣菜。但是，該農夫的行徑受其他農夫質疑，包括他的農場已經是跨內地與香港的規模，是否還屬於本地菜場；而且他受惠於雲南和香港的天氣反差，

⑮ 在另一個由公司舉辦的會議上，香港有機農夫以本地農夫和內地農夫在種植文化有所不同為由，再次拒絕中心主任的建議。他們認為香港農夫是為環境保護、自然及人類健康而生產有機菜，內地有機菜場則旨在製造多一個商品種類，提升利潤。在這種文化差異下，內地有機菜造假的情況更容易發生。中心主任以內地有有機法和合乎國際認可的認證標籤為由反駁，但他不能回答那些菜場在運輸有機和常規菜時會否把兩者混在一起，及會否造成污染等問題。在該次會議後，中心主任決定放棄公司到內地進行有機菜場認證的建議。

在農墟的競爭中以多種不合時令的產品，壓過其他位於香港的小型農場。由於受到批評，該農場之後再沒在農墟出現。

從上述事件看出，對香港有機農夫而言，在內地出產的有機菜，並不屬於本地農產品。在共同購買小組中，筆者也聽到謠言，指合作農場僱用的內地工人向他們分享，從前在內地為規模龐大的農場工作時，工人需要把剛收割的蔬菜放進去一個泡滿化學劑的水池進行「保鮮程序」，而這位工人為了家人的健康着想，會在農場旁的一小塊田地上種菜自用。這種謠言往往在消費者間互相傳播，加固他們相信本地和內地蔬菜生產者的操守有差別的理解，甚至懷疑當香港農夫到內地從事農務後，其良心和操守會否受到動搖。^⑩ 就如 Jakob Klein 研究中國的有機農業時發現，^⑪ 都市與鄉村的地理距離，影響消費者對農夫的信任程度。在內地與香港有機認證及農墟的風波中，Klein 指出的距離感，在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產生；而且，中國內地與香港政治邊界對本地有機農夫而言，是一條明確有關個人操守、個人身份和市場形象的分界線。

九、有機農夫：環境運動及香港身份認同下的新角色

有機食物的出現及流動，使食物生產、分配和消費聯繫起來，為香港帶來一場實踐有機生活態度的運動。這種生活運動原意是把由資本主義帶動的生活方式，轉變為顧及環境保護、可持續、公平貿易、動物福利的發展方式，在香港是由新農夫所帶動。自1990年代起，新農夫開始反思資本主義經濟着重個人利益的模式，是否造成對自然、傳統文化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他們的有機農場在運作初期，會開放給外人作教育用途，有新農夫也試行消費合作社，要求顧客在購買貨品的同時，了解生產者的經營狀況。支持的消費者視選用有機產品為與資本主義抗衡的方法，從而表達一種關顧自然及健康的生活態度。香港的市場、都市、鄉郊及自然環境為他們發揮個人魅力及策略提供了一個空間，從環境及食物議題上逐漸發揮影響力。

^⑩ 筆者進行田野調查期間，比較有經驗且在消費者中具有聲望的兩個農夫曾嘗試以合作或受聘方式到廣東進行有機耕作，但都在數個月後回港。他們認為難以了解內地的農業運作模式，因此繼續回到香港當有機農夫。對於農夫在內地工作的期望，共同購買小組組長多次向筆者表達她對農夫的道德操守會否轉變有所憂慮。

^⑪ Jakob Klein, "Creating Ethical Food Consumers? Promoting Organic Food in Urban Southwest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17:1 (2009): 74-89.

自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及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港澳自由行》等有利內地與香港民間往來的措施實行後，在更緊密的內地與香港的互動下，香港社會運動的政治身份認同討論，集中在香港人身份建構的問題。自2008年起，在身份認同的議題上，本地有機農夫通過反對政府興建高鐵和「鄉郊土地正義運動」，得到社會運動參與者的重新審視和定位。^{⑦⑧} 2008年，政府計劃在八鄉進行部份連接廣東和香港的高鐵工程計劃，其中包括把本文前部份描述的農業聚落移除，以興建地底隧道的通風口。一些非原居民，包括移居該地多年的佃農和其家人，和幾位在市區從事有關保育工作的社會運動者聯合起來，以保衛家園為由，反對政府選擇性收地，^{⑦⑨} 以及只重視經濟發展，不顧本地農業的死活。筆者的田野資料顯示，這些社會運動人士是首次到新界鄉郊進行相關保育活動，他們在長達三年的抗爭活動中，一直通過和以宗族為主的地方精英、新市鎮的行政單位和諮詢單位（如區議會）、甚至其他農夫打交道的方式，了解新界的複雜性，並摸索協助受影響的農夫的方法，例如在報紙、獨立傳媒的網站撰文探討農業及八鄉的農業社群對香港糧食安全、環境保護及經濟多元化的重要性，也協助一個受影響的有機農場作出抗議，替居民以農戶身份索取農業部門負責的青苗賠償。當中，他們詢問了一些新農夫對於八鄉農業的意見，如阿生及一位曾是大學導師的新農夫就利用信件及網誌向外界反映，他們對新界土地發展所造成的土地污染及地下水文系統的破壞十分關注。這些意見成為社會運動人士及受影響居民進行上街遊行、絕食抗議及包圍議會的理據。^{⑧⑩}

在為期三年的抗爭過程中，這些移民家庭在1950年代起的務農和生活歷史被記錄成為口述歷史，在紀錄片、電影、電臺節目和書本中出現，由社會運動人士及受過高等教育的農夫第二代，在主流及獨立傳媒網絡發佈一個主要訊息：這些本地農夫，不管是否從事有機耕作，都對香港社會作出十分重

⑦⑧ Eric Siu-kei Cheng,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Park to Mark the End of Agriculture: Politics of Vegetable Farming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46-2018)," 中山大學第二屆飲食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16年10月。

⑦⑨ 該計劃為地下隧道及通風口的建設，受地下隧道影響的原居民村落並沒有被徵收，但他們地下(sub-soil)擁有權則被徵收；非原居民的聚落位置會建設隧道通風口，因此地上的建築物都要被拆除，使工程得以進行。2009年，社會運動人士聯同一位地理學者提出多個更改路線方案，皆未被政府接納。

⑧⑩ 在筆者的田野紀錄中，相關的有機農業組織沒有透過反高鐵的活動參與上街抗爭的活動，如參與遊行及衝擊政府機關等被支持政府人士及傳媒定義為「激烈」的行為。

大、但一直被忽略的貢獻，包括提供充足、新鮮的食物及維持新界鄉郊的自然環境。在政府的收地過程中，從都市來的支持者充當聚落的守衛，並在社交網絡紛紛把農夫描述為土地的守衛者及本地糧食生產的參與者，認為這些農夫相對過去三十多年以變賣祖先土地致富的原居民、地產發展商及香港政府，更了解及願意保育香港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⑩

在1990年代成為有機農夫的新農夫，慢慢成為對新界耕種有興趣的人的導師；其中兩位在業界比較著名的導師，在農村家庭長大，擁有大學學位，以有機農業或其他非慣行農業的理論及實踐去嘗試解決香港的都市化問題，其中包括阿田。阿田在一個農業聚落的農夫家庭長大，在大學修讀比較文學系，畢業後曾於山明水秀田園任職，及在八鄉經營有機農場，為協會的創會成員之一；在2009年舉行的一個有關共同購買的研討會中，阿田擔任講者，講解他對有機認證的看法，並花了一個小時向與會者推動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作為「民間認證」；由於他多次在報紙上撰文批評政府的農業政策及分享個人的農業經歷，因此筆者的共同購買活動小組受訪者認為他比較重視「筆耕」多於真正的農務。在反對高鐵興建的抗爭中，阿田被社會運動人士邀請進入受影響的聚落，擔任推廣有機耕作及永續農業理念（如以旱廁及堆肥循環再用排泄物的環保廁所），協助受影響的農夫轉營為有機農夫，加強外界對他們作為「本地有機食物」生產者的支持。他也到不同社區組織教授有機及永續農業耕作概念和方法，培育新一批的本地農夫。這些農夫多以「永續」農業稱呼他們的耕作模式，把重點放在農夫和自然生態的互動，及如何利用社區的資源作為農場的投入。例如，他們會在農場附近的豆腐工場帶回常被視為垃圾的豆腐渣作為堆肥，拒絕使用任何市面上可購買的外國有機肥料及農藥商品。^⑪ 阿田認為，這樣本地農業的生產成本才可以降到最低，也可以和社區產生互動，充份利用本地的資源為本地居民生產食物，使本地農業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個組件。這種以重視地方社區的形式所支持的

⑩ 2011年，一群關注本地農業的人士和農夫，到農業部門舉辦的漁農嘉年華抗議，並派發一份名為「沒有本土農業，哪有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的特刊；香港理工大學藝術系的學生進行農夫訪問，製作一份名為「青苗上河圖」的出版物，作為本地農業有機的紀錄。參考理大73028設計組，《青苗上河圖》（香港：Kubrick，2011）。

⑪ 參與有機支援計劃及有機認證的農夫，可以經榮聯社訂購未受化學處理的種子、有機肥料及農藥，當中包括來自比利時的雞糞粒肥、內地的農藥、臺灣及美國的種子等。由此可見有機農業的全球化和商品化。

農夫形象，使其他農夫能以本地菜生產者的形象吸納新的顧客。^③

究竟應該提倡有機、永續還是本地農業，在業界近年引起一些討論和轉變。2008至2011年，因資源問題，協會經歷了一次改名的過程：為了擴展其理念及社會影響力，協會接受律師的建議，改名為有機生活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基金），英文名稱則包括了 sustainable（可持續）、ecological（生態）及 ethical development（道德的發展）等詞，其關注範圍擴大到三者兼備，而不再單單作為有機農夫的組織，有利將來註冊成慈善團體申請題目相關的活動資助。^④可是，在諮詢過程中，部份新農夫認為，由於基金不再是一個只關注有機農夫福利的組織，他們選擇不再續會，退出組織。幾位轉營農夫（如阿梅）卻選擇繼續參與其農墟，更成為委員之一；新農夫阿芳則受惠於基金和一個社會福利組織合作，成功申請受政府鼓勵社會企業而資助的速遞有機菜計劃，向訂戶供應蔬菜。

部份反抗中心認證內地有機菜的農夫，在基金出現後，也組織起來，並於2011年成立另一個有機農夫組織。組織者阿同告訴筆者，他想成立一個「真正和農友實際情況有關」的有機農夫團體，建立新的市場策略，以加大他們的市場佔有率。^⑤該組織為認證有機及自稱有機的農夫組織集體購買有

③ 阿田曾經為一個以基層市民為成員的共同購買小組聯絡幾位農夫供菜，利用社會福利組織為期數年的社區經濟項目，讓基層負擔不起的有機菜進入其社區，並讓組員以勞動力（以勞動時間為單位作為社區貨幣）加上少量現金換取有機菜；在田野調查期間，筆者聽說，有組員進入阿田的農場，在他的蓮塘採集蓮子，再加工製成月餅，阿田則以透過賣菜得到的社區貨幣作為組員的報酬，讓他們能在社區內享用其他服務。在2010年反對政府興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高速鐵路的運動中，阿田在立法會門外的抗爭中亦有到場，他一直在觀看立法會內會議的直播，社工則忙於安排不同的基層團體，包括其管理的社區經濟項目，於皇后像廣場出售手工製品、小食及環保清潔用品，包括八鄉聚落的農夫出售的本地小食，如茶粿。

④ 2007年以後，一些社會福利機構紛紛將有機耕作及相關工作加入其發展項目，並利用有機農墟作為平臺，向市民推廣他們的服務。有機農民可透過參與有機運動，獲得消費者支持及購買其產品。不少例子更是農民透過和社會服務機構合作，以有機耕作對環境保護及弱勢社群製造工作機會等所產生的影響從而獲得社會企業、環境保護基金等資助；社會服務組織亦自行開展有機生產及加工服務，以獲得政府及商家贊助，這些都可被視為有機農民爭取社會環境改變帶來的公共資源的過程，但是，由於農夫數目過少，作為計劃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利於獲得資助的機會，機構職員在填寫計劃書時要以環境保育、被邊緣化的社群為服務重點及對象；協會改名的主要原因，也和這種資源競爭有關。

⑤ 阿同在2009年冬天蘿蔔當造時，在大埔農墟要求農夫們統一以每斤10元的價錢賣出，當作市場推銷，但遭到部份農夫以不想降價為由拒絕。作為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在反高鐵事件中成功以協助有機農夫在賠償和搬遷問題中與漁農處討價還價為由，和一些有機農夫成立有機農友會，作為「和處方協商的有機農夫代表」。

機肥料、種苗，又從廣州運送搭建雨棚、溫室的材料；他們也舉辦有機粟米節，在2011年7月1日的遊行中組織農夫上街示威，反對政府為《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豁免）公告》立法豁免基因改造木瓜在香港種植。其中，兩位經營有機農場的農夫，藉此在數日後由菜聯社舉辦的有機西瓜節銷售本地有機及無基因改造的木瓜，建立新的顧客群，並在其農場開工作坊向公眾介紹栽培有機木瓜；另一位年青的農夫第二代則以回歸田園、種植本地有機菜的農夫形象出現在報紙、新聞的報導上。^⑥ 香港農業議題的討論使有機農夫及其組織出現了社會分工。

2010年的一天，筆者和一位山明水秀田園的職員一起走過山裡鄉村的小徑，避開一群到農場參觀及當假日農夫的人潮，到山另一邊的公共小巴站乘車回市區。面對沿路盡收眼簾的小田地，職員說土地已成為香港農業最關鍵的議題，因為大部份有機農夫都發現，他們很難在受內地與香港資金、政策互動而影響的新界土地裡，租到適合有機耕作的田地。他們很想選擇遠離污染的土地，及以合理價錢獲得長期租約（約為每年每斗2,000元及租用至少五年）。各環境保護組織及有機農業業界也明白，由於土地是由地主及政府機構中其他部門控制，農業部門對農業的支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其農地復耕計劃對他們而言無甚幫助。對從都市來、沒有鄉村人際網絡的新農夫而言，很難租到接近被政府計劃發展的地區裡的田地進行耕作。2012年夏天，一些環境保護團體、有機農夫組織和山明水秀田園在一個非原居民聚落聯合舉行記者會，反對政府在該區進行土地發展，遷走居民及農戶。他們對政府的規劃建議是「農地零損失」，要求一個關顧農夫、農地及農業的政策。香港的有機農業社群，繼續開枝散葉，並不斷求變，適應及抵抗和中港關係息息相關的土地政治。

本文重點放在有機農夫在香港農業中的角色，當中環境保護、食物安全及政治身份認同等因素，為這個角色帶來持續的改變；有機農夫在這些受香港人關注的議題上，也很積極地參與其中。Richard Peets 和 Michael Watts 認為社會運動及對自然的理解變更了人際網絡中不同的物質、話語，當中涉及的權力和社會結構，需要和個人的主體性緊扣。^⑦ 農夫作為鄉郊土地、環境

⑥ 一位農夫在會後接受記者訪問，分享他從市區工作回到八鄉的家幫助母親轉營有機農場的經歷。其目的除看好有機農業的前景、工作時間比較有彈性外，也是抱有自小對自然和在農田上的苦與甜生活的一種懷念。這種感情(qenqin)在筆者看來，是重新認識自然和對鄉郊生活的反思。

⑦ Richard Peet and Michael Watts, eds.,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 New Yor: Routledge, 1996).

政治的參與者，其行動力不單是法津的、正式的，也可以是由個人及非正式社會經濟關係而決定的。

對香港的有機農業業界而言，應壯大有機市場還是重視本地農業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困難在於兩者在殘缺的本港農業面積、人口和政策下，看來不能相輔相成。對他們而言，這一個政治經濟的問題，不能單以對鄉郊抱着懷舊的心態去解決，而是要從生活態度上改變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重組一套有利於香港本地農業的論述，再把建議帶到環保及農業政策層面的討論上。在香港，本地有機食物作為一種商品，也是一個複雜的食物種類，香港人將其作為抵抗資本主義下自由市場對環境、道德經濟、食物安全及個人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方式；回歸前後，香港人不滿依賴內地的香港政治經濟體系而形成的一種香港身份認同，於是透過全球化同時亦一直在地化的食物生產及消費概念，把有機食物孕育成本地身份的一個象徵和文化資本。就此而言，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形成，不只是個人對身體的關注，更是反映對現在政治經濟的不滿。嘉道理農場在一次展覽中，寫了一條香港環境保護及有機農業組織普遍認同的可持續食物生產公式：

$$\text{真正食物生產成本} = \text{生產成本} + \text{環境保護} + \text{公眾健康} + \text{農夫勞力} + \text{食物安全} + \text{生物多樣性}$$

對於有志於重新認識都市以外生活及環境的人士，如有機食物的消費者及社會運動人士而言，農夫就是重新連結城鄉的關鍵人物。農業及食物生產在香港政府及商界傾向於土地工業化及地產化的前提下，成為社會運動者眼中較為可持續的一種活動。本地農夫透過有機耕作，洗脫從前污染者的形象，成為都市化人口眼中的一個自然、鄉村及食物安全專家，以每天生產食物、關注食物安全及保留對自然的傳統知識，守護香港人的土地。不同農業組織在社會議題上短暫合作，和農夫靈活運用香港人的身份，使有機農夫成為能帶動香港身份認同討論 (activist-led Hong Kong identity) 的行動者。⁸⁸ 這現象

⁸⁸ 馬嶽認為，自1980年代後，這種和生計有關的關注組成為以當地草根運動為主，在與地區有關的議題上組成短暫的聯合群體 (*ad hoc coalitions*)。Ma Ngok, “Civil Society in Self-Defenc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ed. Ma Ngo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3.

延續了人類學者所指出的殖民時代前後出現由食物建構的香港身份認同，^⑧也印證了有機耕作作為一個概念，以本地自然及人文環境為前提，把不同背景的人連繫起來。^⑨在筆者看來，有機食物得到這種獨特的意義，經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落戶過程。筆者提出的論點是，透過以下兩個過程，本地有機農夫的定義和角色與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認同緊扣起來：

1、把本地有機食物道德化及商品化

在20世紀，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舉世知名的城市，但農業卻漸漸萎縮，都市化增加對自然和生活環境的壓力，促使一些受教育的人在週末到鄉外呼吸新鮮空氣，有機耕作就成為他們反思香港社會的契機，學習有機生活變成一種抵抗。對鄉村的浪漫想像，使他們投身全職的有機耕作，卻發現現實是殘酷的，需要組織起來找尋新的路向。從下而上發展出來的新市場，使政府部門正視農業問題，以有機耕作作為一種解決方法。當消費者逐漸享受自由市場系統帶來購物的便利，重新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係使他們理解食物生產為何物，也意識到本地食物生產對他們區分內地和香港的重要性。其中，「良心菜」、「良心農夫」這些概念出現，也是本地和有機成為社會運動的兩個重要元素。本地有機食物在這個歷史脈絡下的出現，成為聯繫不同階段、宗教、地緣背景的人的一種交易貨品。它既滿足了生計、物質的要求及對自然環境的想像，也體現香港人作為全球化的一份子對另類新生活的渴求，成為解決都市化、現代化及全球資本主義蔓延的一個反思。

2、從食物到另類生活態度的實踐

認證有機食品使有機食品變得商品化，當商人加入，加工、運輸與量化有機食物變得比從前容易。香港的新有機農夫卻仍以良心、平等和本地化為主要理念，在討生活的同時，也以食物作為中介，顯示他們對生活有一些反

⑧ 陳蒨以盆菜為例，探討香港人在回歸後如何象徵性區別香港人和內地人的身份，她認為從宗族到香港人食用盆菜的變化，可見多元族群使香港身份認同呈現複雜性。Chan Ching Selina, "Food, Memories, and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7: 2-3(2010): 204-227.

⑨ 要注意的是，在香港，鄉村的身份從不是固定及既定的。Nicole Constable 描述了客家、基督教徒及中國人的身份如何被建構，使客家人成為一個混合多個身份的族群。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29.

思和新的實踐。James Scott 解釋農民的道德經濟是以自給自足為底線的，^①只有在道德經濟被破壞的時候，他們才會從互惠互利的社會關係變成「明顯的道德轉變」(a shape moral departure)。^②在可耕農地面積逐漸減少、農業人口下降的香港，有機農夫再次定義農業，和不同背景的人、組織合作，有機食物成為寶貴的資源，這種反抗是在生活上的，並非要推翻政權或是打倒任何敵人。他們多是選擇生活態度的改變，及對個人操守的反思，再在個別事件上和政府部門及認證機構周旋，以完成任何形式的轉變。在農田上進行實作，對環境進行保護，供應安全健康的蔬菜，使有機農業得到市場及社會的認同，甚至使本地傳統農夫也樹立「比內地農夫有道德」的形象，此種論述在農業及土地運動中往往大派用場。^③本地農業作為道德經濟的論述及實踐，甚非香港政府介入市場時的出發點，卻成為香港農業得以延續下去的正能量。

十、總結：從不靜止的香港農業

2010年，一位專門報導本地農業的獨立記者於一個農業地區的導賞團中，曾反駁一位社會運動者認為本地農業對香港自然環境作出多年貢獻的說法：「你們不要以為本地農夫在瓜棚內種滿了瓜藤就一定對有助保護環境，這種方法一定要配合很多農藥，不可能是有機耕作！」參與這一場本地有機農業運動的各界人士，對香港需要有機、本地或是兩者兼備的農業，各有論點。本文並非要分清本地農夫還是有機農夫貢獻較大，而聚焦於有機農夫如何看待都市化及食物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及環境問題。由於他們認為農地被過度開發、農產品市場制度不夠公平、以及政府在環境保護和發展政策沒有取得平衡，他們選擇嘗試新的生活模式，包括從事有機耕作、進行透過人與人關係建立的食品交易、及利用鄉郊土地作為自然保育的空間。這些和有機農業相關的行為，圍繞着本地概念而展現人前。本地有機農產品作為商品，為有機農夫詮釋各自的理想和對主流社會的不滿提供社會空間。本地有機農

① 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3-194.

③ Eric Siu-kei Cheng,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Park to Mark the End of Agriculture: Politics of Vegetable Farming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46-2018)," 22.

產品和全球對環境及食物安全的話語相連，農夫藉此增強其市場競爭力，也使他們對有機食物定義的操控，成為新的社會政治角力點。

本文把人與自然的關係放進地方社會的政治及歷史脈絡，討論有機農業及有機生活態度的出現，可被理解為食物生產、加工、消費與環境生活運動的關係。在自由市場的理論裡，生產者與消費者作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金錢經濟取代，但香港有機農業界出現時，新農夫鼓勵消費者接觸他們的食物生產者及加工者，以了解食物的生產和加工過程，新農夫亦試行沒有中間人、單純以金錢作為中介媒體的銷售方式，以農墟和直接交易來建立另類的有機消費市場。部份消費者在投入這個新市場後，更從事假日耕作活動及投入農夫組織；他們加入這些行列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宗教信仰、對自然的關注、對有機農夫的尊敬及對社會不平等情況的宣泄。有些消費者、社會運動者也利用這種新的生產者及消費者關係，重新理解全球化、本地食物生產及作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關係。有機農業的出現，為從都市走到鄉村的社會運動帶來新的元素；有機農夫以土地守護者的身份，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產生一個小型的生活運動，甚至把傳統農夫的生活也改變了。一個充滿合作機會，卻又時刻互相競爭的農業社群，為香港農業帶來生氣及持續改變的動力。

（責任編輯：唐金英）

附表1：新有機農夫和傳統農夫比較

	新農夫	傳統農夫
居住地	都市	鄉郊
教育程度	普遍懂得英語及專上程度	小學程度或不識字
泥土	要求沒有農藥、垃圾、重金屬及化學污染殘留	以生產力為首要要求
水源	未經污染，上遊為佳	最接近田處
種子	有機種子或未經化學處理	任何
工具	手握的工具	農藥噴灑器
肥料	堆肥、花生麩及牛骨粉	堆肥（包含化肥）、花生麩、牛骨粉、化肥如紅丸及藍丸
農藥	天然元素	化學合成
設備	雨棚	以雞、豬舍改成的棚、溫室
農田租賃	兩至三年續約一次	沒有期限的口頭合約

資料來源：筆者2008年的田野資料。

Old Field and New Farmer: The Localization of Organic Farming in Hong Kong

Eric Siu-kei CHE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ocaliz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It also analyzes the role of Hong Kong farmers in cross-border politics, Hong Kong identity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ood safety issu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agriculture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especially that vegetable gardening became the major sector of the local agro-food system. Chinese migrant farmers formed their community and benefited from the “Vegetable Revolution”. However, they encountered challeng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ging farming 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food safety issues. Some urban elites introduced organic farming and cooperated with consumers and other communities to explore new marketing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organic farmers were contested by different parties who questioned the authenticity of organic food. Organic certification agencies emerged as a governance tool, but they could not extend their service to mainland China, the largest food exports to Hong Kong, because Hong Kong local farmers and consumers fail to trust mainland Chinese organic food. Organic food is not only a new type of commodities, but also a product of moral economy in Hong Kong.

Eric Siu-kei CHE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Room 208, Building B, 369, 2nd Section of University Road, Taitung, 95092, Taiwan, R. O. C. E-mail: chengsk@nttu.edu.tw.

agriculture. Moreover, organic farmer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Keywords: Farmers, authenticity, Hong Kong identity, lifestyle, organic certification